

第五章 共時的基調：電報、鐵路與風俗轉變

現代性是以即刻性與間距性被標識的，發達的中介工具，如：電信、運輸工具、卓越之衛星技術、功能強大之電腦網絡、手機通訊，飛越的速度改變時空之展現，使人們重新理解空間與時間的轉變。透過中介傳輸，民眾無論居處何處都能迅即、無時差地掌握所需的新知、信息，或與他人連繫，開啟人類史上第一次全球性的在場；都市、社會、國家亦因有著方便的聯絡網，開啟不同的交涉、溝通模式。憑藉傳播事業之發達，人們對環境驟變的瞭解在時間上加速了，在空間上擴大了，在程度上精確了，一個人從極小之生活範圍，漸與瞬息萬變的社會產生接合。相對的，傳播在鞏固民族—國家之行政一體化的過程中扮演至關角色，全世界以微妙姿態被牽引在一起，原本遙不可及的彼岸，瞬時成為人們心理上鄰近地域。視野的拓展，令原本安於「阡陌交通，雞犬相聞」之人民，被迫面對遠方正在發生、歷經的一切，域外無他，人們在共時之境域裡，學著梳理人我關係，思索家國社會對自身之意義，重新建構對外之認知與應對能力，實如論析：

交通、通訊，尤其是信息的現代系統脫離了對位置中心的、前現代的突出人、事件、組織、全社會不再簡單地與單一的地方或特定的時間相關聯，現代性的本質是它在本地的時間、空間、人與全球事件、標準化時間的地平線、不斷變化的空間安排連接方面的能力和必要性。在迅速變換的現代性的風景中，社會思想家正在重新思考地域與時刻之間的根本關係，他們在重新思考空間與時間之間微妙的、動力的平衡。空間和時間已經成了思考現代性組織與意義的媒介。¹

透過傳媒為中介的世界村正在成形，源於十八世紀電力技術（electric technology）之發現與運用，拆解原本難以跨越的時空屏障，時間與空間之差異不復存在，因空間的延展不會造成時間的延宕，資訊和象徵內容可傳輸極遠的距離，卻不會造成時間上的延遲。²除卻時間和空間的具體意義，從電信、運輸科技大幅提升當刻，有形之空間藩籬逐漸消解，距離感已不再是阻絕信息傳播之藉口，社會生活步調之加快，雪片般飛來的信息，將人們拉入全球互賴的網絡中，加速「同時性」

¹ Friedland, Roger & Boden, Deirdre: *NowHere: Space, Time and Modernity*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c1994), p.1-3.

² 麥克魯漢：「經過了一個世紀的電力技術發展之後，我們的中樞神經又得到了延伸，以致於能擁抱全球。」見（加）埃里克·麥克盧漢（McLuhan, Eric）弗蘭克·秦格龍（Zingrone, Frank）編，何道寬譯：《麥克魯漢精粹》（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2000），頁222。

時代到來。³虛空化的時空成為推動現代性體制之重要組織媒介（organizing medium）。⁴

令時空轉變的新式傳播科技，在晚清時期正式步入人們生活，電報與新式運輸工具（火車），是去除時空分離最具代表之傳輸工具：「電報」以飛越速度，破除自然疆界之限制，讓時差不再是阻絕人類往來之屏障，使人類可達即知、即聞之共時感。又，運輸工具速度之提升，催促各地區必加以協調龐雜之時空問題，方令各地之運輸協調、一致。中介工具如現代傳輸工具在中國，非但開啟晚清人們對世界之認識，亦創出所謂「中介的世界觀」（mediated worldiness）：人們重新感受經驗外的世界，透過體驗世界、觀察他人以重構時空網絡，建立與全球對話之新文化關係。⁵戴維·莫利（David Morley, 1949-）對衛星軌道與無線信息之描繪，同樣合用於十九世紀的中國：

人口、文化、貨物、信息的遷移、流動方式表明，現代並不主要靠諸如地理位置間隔海洋、山脈等自然分界來劃分社會或國家的「自然邊界」。我們越來越需要根據傳播或運輸網絡與語言文化這樣的象徵分界來劃定在這個時代裡具有決定性意義、呈現滲透性的邊界。⁶

新傳播媒介及運輸工具之取用、發揚，不僅影響個人在社會生活中之時空體驗，隨著世界時間之標準化以及速度、同時性與時空的拆解，正改變人們對時間與地域之概念，一套為社會所納受之新時間觀逐步成形。

第一節 跨越時間的藩籬：電報、信息

一、清朝之郵驛網

郵驛制度在中國歷史上，向來備受重視。制度之完好程度，關係整個帝國之安全與軍情流通。周朝以烽火作為警報方式，與擊鼓傳聲交叉運用，是謂「烽可遙見，鼓可遙聞」使訊息可廣泛地傳布、響應。日後，傳遞訊息的手段不斷革新，

³ 早期歷史階段，同時性的經驗（事件在「同個時間」發生）意指地方人士能同時經驗到的事件。同時性等同地方性指涉，人們囿於空間、活動能力有限，對「同個時間」之感知只侷限在「同個地方」。自從電信科技對時間、空間進行拆解，地方性的空間條件自此從地方性經驗脫離，同時性的經驗可以在距離較遠的空間生發。相對於具體的「此時此地」，一種不再特定與地點綁在一起的「此時」感逐步產生。同時性在空間中延展，其範圍最終擴及全球。

⁴ 安東尼·紀登斯：「時間和空間的變革已經被康德的範疇在哲學上表示了出來，但更重要的是，它成了現代性的體制性推動力的組織媒介（organizing medium）」見 Roger Friedland, Deirdre Boden *NowHere: Space, Time and Modernity*, pp.xi – xii.

⁵ 見 Jordan, Tim 著，蔣宜臻譯：《社會變遷》，頁 220。

⁶ 見（英）戴維·莫利（Morley, David）、（英）凱文·羅賓斯（Robins, Kevin）著，司豔譯：《認同的空間：全球媒介、電子世界景觀和文化邊界》（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2001），頁 1。

春秋戰國有郵傳、秦漢時代有郵驛，隋唐後設有專司官員任其事，到明清塘報的發送直接由兵部統轄，負責軍情報告。整體來說，「郵」是傳遞公文的通訊組織；「驛」負責提供各類交通或通訊工具。漢唐以降，歷朝大致均將「郵」、「驛」功能二分。至清政權建立，突破傳統框架，正式將交通與通訊融合一體，由驛站直接辦理通訊事務，充分利用驛站之馬、車、船等交通工具，以及馬夫、驛卒等傳遞人員，使文書傳遞具更近保險、完整之組織。

囿於政治、經濟、交通等條件限制，歷代驛站往往僅設於交通要塞，且數量較少。鑒此，清政府提高設站之數量：首先，於邊疆地區加置各式郵驛組織；其次在各州縣設立「縣遞」，用以溝通地方間的聯繫，彌補幹線驛站不足。這類「縣遞」對增強中央與地方、地方與地方間之接洽起有一定作用。以山東省為例，乾隆年間共設驛站五十餘處，光緒時增為一百三十九處，所增驛站大部分為「縣遞」。清代前期數朝君主，對於郵驛傳遞公文的速度多有明晰規矩，務令嚴格奉行，故而通訊效率較各朝有所提升。例如，此前馬遞公文最快速度，通常為每晝夜四、五百里，清代則以每晝夜八百里之記錄傲視歷代。此外，郵驛組織於中央兵部設車架清吏司，掌全國郵驛與馬政，下設驛傳、腳力、馬政、馬檔、傳送各科；「會同館」專責帝師之驛傳事務；「皇華驛」是京師驛站，是全國傳驛樞紐；馳送文報則由「捷報處」負責。清代郵政下分驛、站、塘、台、所、鋪六款組織模式：「驛」設在盛京與各省腹地，負責內容以傳遞信件、迎送使臣與運輸官物為主，以傳送緊迫公文為首要任務。「站」專門傳遞軍報，各站由千總肩負，其夫、馬、錢、糧歸由所在之廳、州、縣管理。「塘」、「台」分設於新疆與西、北二路，負責邊疆郵驛，由軍卒充役，以飛遞軍事文報為主，兼具巡邏、偵察、運輸職能，是疏通邊區與內地聯繫之通訊機構。「所」原用於運送官物，性質與「驛」相近，性能後多消退。「鋪」設在各省腹地，專門傳運地方與中央之普通文件，每十五里設一處，網絡縱橫，規模龐大。⁷質言之，清代郵驛制堪稱歷來最完整、溝通網絡最大，其以京師為中心，做輻射網向四方散逸，全國信息依緊要程度決定速度，交由二千餘個驛站、七萬名驛夫、一萬四千個遞鋪與四萬名鋪兵負責串連。兩大主幹渠道分別以驛站為主體之水路驛網，與以急遞鋪為主體之步班遞鋪相互交織、銜接，維持中央與地方、內地與邊疆流暢，對有清政權的穩定與文化交通方面，起著莫大作用。⁸

（一）舊式傳播網之陋缺

晚清中國的傳播網看似周密通達，然與近世電報傳迅速度相比，勝負立時分曉。在電報未為普及傳播工具前，以清同治十一年（1872）創刊之《申報》為鑒，

⁷ 見張岱年主編：《中國文史百科》（浙江：浙江人民出版社，1998），頁434。

⁸ 同前注，頁435。

此報為廣開交流渠道與力逮時效性，最初以郵寄方式取得《京報》內容，以逐日轉載方式完整呈現。⁹回歸當時景況，《京報》由北京遞送天津，再赴輪至滬地，經常速郵遞需六、七日方可抵達，若遇冬末春初，北洋封河，輪船停航，各信經陸路送滬，曠日益久，加上報社排版、編輯與印刷時間，京地新聞傳到滬地人手上，又過了十天、八天之久，名副其實地成為舊文，這已是海運暢行後異常敏捷之景況。¹⁰倘以《上海新報》為例，其於1861年由字林洋行（Pickwood and Co.）發行，是第一份在滬地發刊之中文商刊，較《申報》之出現整整早了十年，其將主要讀者群鎖定在滬地「為商賈者、開店鋪者與客商」，辦報主旨於發刊辭中清楚詳列：「大凡商賈貿易，貴於信息流通。本館印此新報，所有一切國政軍情，世俗利弊，生意價值，船貨往來，無所不載。」聲明一切內容，以提供利於商業資訊、廣告與船期為主。因時值太平軍戰事吃緊時分，為提供滬上居民戰況新知，遂不定期地擷取疏奏廣茲討論，直言：「此外如近日賊蹤以及中國軍務，不分遠近鉅細探有的信，本館亦即附刊。」¹¹儘管明言「不分遠近鉅細」等「賊蹤」同為發刊內容之一，但在海上網絡未全備時，僅仰賴陸路驛地或水道運河，遲延之時間亦發長久，正如張蒼水所言：「春來閱邸抄，知去年十一月緬夷內變」¹²，「邸」即為「京報」之異名，從朝廷發行，復經傳抄、發佈，後至各級官員手中，已歷過一個季節，上下不通、訊息阻塞，實是老大帝國裡一大弊病。

事實上，憑藉清朝稠密之運輸網絡，邸報的傳遞速率還算急速，在不受天候、戰事干擾之正常情況下，通過完整的驛運塘路，速度在當時並不算慢，但最快仍要十餘日，這還必須是在各大通衢要地，才可能獲得之便捷。反觀同時期的西方國家，電力行使催化新時空觀出現。透過電報科技，各地方以前所未聞的方式予以連結。在電信出現以前，除去少數以烽火或旗號等訊號為溝通模式外，所有通訊皆仰仗實際輸送物件（馬、車、人），使具體形式（信札、貨品）之信息得以

⁹ 西漢實行郡縣制，將全國劃分全國分為若干郡，郡以下置縣，官員由中央任免。各郡於京城長安設有駐京辦事處，住處以「邸」名之，派有常駐代表。其首要任務負責傳遞皇帝與各郡首長間之聯絡事項，定期將頒佈諭旨、詔書、臣僚奏議等官方文書，以及宮廷大事等相關政治情報，快馬通過驛道，令文書傳送至各郡長官手上。此即是《邸報》產生的背景。自漢、唐、宋、元、明直到清代，《邸報》之名稱雖屢有改變，但發行卻未曾中斷過，其性質和內容亦無太多變動。直至歷代對驛道之改善，《邸報》的傳送速度有增長態勢。唐玄宗年間（西元713年到755年）《邸報》又稱《開元雜報》，時已成為全國官吏間流通之新聞刊物。時至宋朝，《邸報》發行之時間趨向固定，明代更專設《邸報》通政司，職司《邸報》之出版發行。明末崇禎年間，《邸報》從手抄或木刻印刷改為活字印刷，規模擴張繁速。至有清一朝，是《邸報》發行量最蓬盛時期，日後易名《京報》，同樣專為官方信息服務。

¹⁰ 《申報》告白：「啟者，所有《京報》本館專託友人郵寄至申，異常迅速，閱報諸君總以先為快，本館不彈繁瑣，接到即刊，俾供象覽。故今日又將本月十五、十六兩日《京報》刊發。」見《申報》，同治甲戌年四月二十九日，第六百五十一號，冊4，頁539上。

¹¹ 見本館謹啟，《上海新報》1862年6月24日，第四十五號。

¹² 轉引自劉永強：《明清邸報與文學之關係》，收入《北京大學百年國學文粹 文學卷》（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8），頁561。

暢行於空間中。實體物件之搬遷過程，無具及時性作用，一般時日尚無可應付往來，若遇危急存亡之秋，例以兩軍開戰，密札來往所耗之時往往錯失致勝先機。此時，唯有運輸傳播速度加快，才可縮減距離隔膜。

時值十九世紀中葉，中國各處紛起之民變與亂事，令驛遞、文報羽檄交馳，人馬俱疲，通衢杜絕，無足應付雪片般之書札往來，時有官兵聞訊趕至，起事人民早已杳無蹤跡之頻傳事件。各式例證，足證晚清郵驛系統，縱然傲視歷朝，時至近世，方無法對抗空間帶來之時間蹇滯。易言之，倘若晚清時空延擴之生發，必通過媒介工具之行用方有所得，則新媒介必以「電報」之援引堪足表率，因電報所確立之通訊與運輸，將地理學家所謂之「距離的磨擦」降到最底限度，瞬即達成的通訊橫跨距離上之分離，時間走出空間之迷障，人類不再為錯時或時差懊悔不已。傳統中國引進全球最新的傳播技術，一舊一新之間有著盤根錯節的複雜因素，一如麥克魯漢所言「任何媒介（即人的任何延伸）對個人和社會的任何影響，都是由於新的尺度產生的；我們的任何一種延伸（或曰任何一種新的技術），都要在我們事務中引進一種新的尺度。」¹³繼言之「電報是第一種新型的電力媒介，它的滴答滴答聲彷彿在敲打著印刷時代的訃告。」¹⁴確實，電報技術之師法，對傳統中國社會不啻是項全新事務，它的出現讓沿行千年之郵驛制退居次位，並為不同地域的人們，開啟不一之溝通管道，提供民眾開啟寬廣視域，滿足與加速其走向世界的步履。

（二）艱難的起步

十九世紀中葉之中國，朝廷官員誠於電報為西人物產，縱然耳聞其神速，然對洋商與各國領事殷切祈求鋪設電報之態度，多有畏忌，幾經密會仍躑躅不前：一來，唯恐利潤為西人所恃，禍於中土；二方面，囿於風水之說，憚引起華民非議。敷設電報一事遂日日、月月地延宕不已。

事實上，早於五口開埠初期，1851年寧波教士馬高濤（Daniel J. Macgowan）出版《哲學年鑑》，其目的即要將西方電報原理傳與中國人士，使之體驗通訊快速之成效。¹⁵此書甫出版，旋獲得《華北捷報》（The North China Herald）青睞，以詳文介紹此中奧秘，大肆呼籲上海地區應引進此等設備以利商業與航線交流。附帶提及：早期報紙期刊的出現與西方商業資本之生成有極大聯繫，當貿易行為橫跨重洋，商業交易遍及各大洲，鉅資於其間流動、疏通，掌握船期與物價是獲利的致勝關鍵。定期且廣佈資訊之商業報刊遂於各大航道要塞、商鎮城市因應而

¹³ 見（加）埃里克·麥克盧漢（McLuhan, Eric）弗蘭克·秦格龍（Zingrone, Frank）編，何道寬譯：《麥克魯漢精粹》（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2000），頁227。

¹⁴ 同前注，頁371。

¹⁵ 見黃嘉膜：《中國電線的創建》，收於中華文化復興運動推行委員會主編：《中國近代現代史論集》第10編（台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4），頁286-287。

生，舉凡船期、物價與各大廣告，是構成報刊之三大支柱。十九世紀以來，伴隨歐洲商賈足跡踏上中國，類似的商業報刊逐步滲入中國沿海口岸，主要的讀者，為居住於中國的外國商人。外文商報進入中國的時間幾乎與各港口與西洋互市之時序交疊，初期主要的外文報刊中心為廣州、澳門、香港等地，五、六年代後，上海龐巨之商機，使之成為各報館必爭之地。¹⁶1850年8月英文周刊《北華捷報》創刊，標誌時稱亞洲第四大港的上海，開始出現定期、連續性的新聞傳播媒體。¹⁷它既是僑民共享之論壇園地，也提供貼合之信實資訊，內容取向主以商業報導為重：專門提供買賣消息、商船往來與介紹新物的廣告為主幹，其後刊行之《上海新報》亦以商業導向為要。伴隨來滬外僑人數增加，報刊除了商業功能外，亦提供告知新聞之服務，內容以母國消息與足以影響商業發展之國際局勢最受重視。職是之故，關於如何架設電線以促進東西通信流暢一事，成為滬地洋商們關切、磋商焦點。¹⁸

清咸豐八年（1858）秋印度《友報》專欄倡議英政府可自印度仰光鋪設海底電線至星加坡、澳洲，甚至中國，藉助電報可瞬及掌握行市各項貿易利潤，特別是鴉片豐厚之利潤，格外令眾商嚮往。¹⁹自此，鑒於商務需求，通商口岸議設電線之聲越發頻切。除卻商人與外國輿論界之殷切呼籲，英法聯軍後，各國更將敷設電報一事，提升為外交層級。清咸豐十年（1860）、清咸豐十一年（1861）、清同治二年（1863），各有法國專使、俄使、英使與美公使向朝廷總署提出鋪設電線之暢議，均遭婉拒。接續其後，大清同治三年（1864）、同治四年（1865）各國派出總務稅司、海關稅務司與英領事巴夏禮等人決議雙管齊下，陸續與朝廷商會，另方面轉向地方官員施壓，迫其允諾。朝廷鑒於茲事體大，遂發密函以告：

中國地勢與外洋情形不同，倘任其安置飛線，是地隔數千百里之遙，一切事件，中國公文尚未遞到，彼已先得消息，辦事倍形掣肘。且該線偶值損壞，必歸咎於官民不為保護，又必叢生枝節。²⁰

顯見朝廷大臣對電線之飛速稍有所聞，然恐於中國密件、軍機為外所奪，且驚懼落百姓口實、橫生枝節，遂不願輕冒風險，連連拒卻。不僅朝廷官員對外商領事之態度存有疑忌，各地要員更是沆瀣一氣，指陳：「各國領事設銅線鐵路諸法，既欲潛通消息，難免包藏禍心。務當嚴詞竣拒」，朝野上下對鋪置電線事宜，

¹⁶ 關於中國商報之創辦年代與地點，詳見李仁淵：《晚清的新式傳播媒體與知識份子：以報刊出版為中心的討論》（台北：稻香出版社，2005），頁57。

¹⁷ 《北華捷報》初期印製二百份，受到英國與亞洲各港口的普遍重視，見馬光仁主編：《上海新聞史（1850—1949）》（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1996），頁14—15。

¹⁸ The North China Herald, Vol. 1, NO32, March 8, 1851; The Chinese Repository, Vol. XX, No5 May 1851; The North Herald, Vol. , August 30, 1851. 轉引自黃嘉謨：《中國電線的創建》，頁286—287。

¹⁹ The Friend of India, October 14, 1858, 轉引自黃嘉謨：《中國電線的創建》，頁287。

²⁰ 見世界書局：《洋務運動文獻彙編》（台北：世界書局出版，1963）冊6，頁325。

皆難應允。²¹其中，時任江蘇巡撫之李鴻章，因與西人周旋經歷豐富，函稱：

設銅線法開鐵路二事，各國爭欲舉辦，而英國覬覦尤甚。蓋其商船入中國者最多，此二事於商人最有利益。銅線費錢不多，遞信極速，洋人處心積慮安辦，將來不之能否盡阻。至若不能禁，唯有自置銅線，以敵彼飛線之一法，存而勿論。²²

李鴻章具先見之明，深知在中國敷置銅線為大勢所趨，僅有時之早晚之別，與其無法盡阻，不如自開利權因應，縱然李氏早有盤算，可惜在反對聲中未可即刻實踐。與此同時，越來越多國家對電訊之便捷與藏匿商機有所體會，對中國索求益熾，對談之代表領事，紛紛提出周全計畫及開出優惠條件，企圖鬆動中國當局頑強立場：清同治三年（1864），俄國公使倭良嘎里（A. Vlangaly）片遞「通線揭要」舉證英、美、法、俄近年因電線獲利倍蓰，強調：「通線一行，於國課尤有裨益，即以國政論，既有通線，則無論遠近，皆如同處，在四方既有幅輳京師之勢，在京師亦有遙執四方之權」通曉點出電線對執掌統御之助益，盼達誘以利、動以情之效。²³隔年正月，英使阿禮國（Rutherford Alcock）亦建議中國應安設電線以求自強。於後，法使伯洛內（Henry de Bellonet）照會表示，倘中土肯敷京師至上海與京師至恰克圖二路電線，法國方面「將合約所載中國不便之處，如洋貨只納關稅，不納釐捐等費之條，必能著中國隨便辦理，亦必於別國欽差商量，皆一律依辦」，傾其所能提供中國諮商、方便。²⁴朝廷以為彼等所陳不無可供商議之處，方傳令沿海各將軍督撫與南北洋通商大臣悉心商榷，卻未達成共識。

（三）先「行」者與先見者

眼見朝廷立場躑躅未決，上海僑商焦炙難耐，每一日的市場行情、物價波動、運費與匯率等，處處攸關大筆財貨出入。清同治四年（1865）上海英商利富洋行擅自在浦東一帶架設電報線路，豎杆 227 根，計程四十二里，時任上海道台丁日昌（1823-1882）以其藐視違約、窒礙風水農田為由，著令府方率民眾一夕拆毀，此舉引起英領事抗議，要求賠償造價二千餘兩²⁵，復因眾情洶洶，加上期間有一華民暴斃，洋行復造電線與賠償之要求遂息。

基此經驗，列強熟知短期間，無法令中國正式承認電線敷置之合法，決議私設電線復迫中國認可。清同治九年（1870）英國大東電報公司與丹麥大北電報公

²¹ 見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編：《海防檔丁 電線檔》（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57）第 8 號文，頁 8。以下簡稱《電線檔》。

²² 見《電線檔》第 9 號文，頁 8-9。

²³ 見《電線檔》第 27 號文，頁 29-30。

²⁴ 見〔清〕寶鋆等奉敕撰：《籌辦夷務始末：同治朝》卷 43，頁 35。

²⁵ 見《電線檔》第 20 號文，頁 17-19。

司秘密協商，劃分在中國設置電報線之勢力範疇，協定上海以北之水線歸大北門公司經營，香港以南的水線歸英商籌劃，上海與香港之間協同經辦，且確定由大北門公司出面興辦滬港水線。1870年6月上旬，工部局在漢口路經二擺渡至虹口一線架搭電報線，供三處補房傳達消息，此為上海設電報之始。清同治十年（1871）大北電報公司將橫貫歐亞兩大洲之海底電纜接至上海，正式開放華商電報業務。至此，上海有可經日本與俄羅斯通報之「北線」；另可經香港與歐、美聯繫之「北線」，這兩段電報線扭轉往昔需靠水路獲得訊息之路徑，大幅縮短掌握資訊之費時。自此上海正式與世界接軌，納入電訊版圖中。時人更對電報之神速留下深切想像，讚言：「奇哉電報巧難傳，萬水千山一線牽。頃刻音書來海外，機關錯訝有神仙」，下附小言「地線信一名電報，數萬里重洋，朝發夕至」²⁶、「消息通遍異等間，巧憑電線露機關。不須山海嫌修阻，千里音書一瞬還。」²⁷、「不須鯉記與鴻傳，音線音馳萬里天。兩地語言傳頃刻，勝於羽箭疾離弦。」²⁸這三則竹枝詞之共通點，皆謀擘電線可破除山川水阻之特點，差可比擬羽箭飛馳之速。

（四）滬上郵務系統

上海取得電線起用之頭籌實至名歸。於此之前，電線的重要性已漸為多數人通曉，特別是在首線的出使人員，其將歷行見識與所見詳加記錄，甚至繪圖以曉國人，其中不乏對電報之介紹。如清同治五年（1866）奉命出使泰西之斌椿，對「電機寄信法」即有如下評釋：「電機信外洋各處皆有，用鐵線連綴不絕，以鐵線之一端畫字，其一端立千萬里外即照此字寫出，不逾晷刻也。」²⁹張德彝於《航海述奇》亦描摹：「雖隔千萬里亦然，其最捷者莫過此也。」³⁰不僅對電力傳輸之速留下深切影象，旅洋者對現代郵務設施之便捷，亦有深刻印象：

大門之際有一橫縫，俾人投書信於其間。門內有筒接受，亦既投入，將鈴一掣或扣戶二三聲，俾內知覺啟取。³¹

書信之取收，無庸另出擇取，郵件往復捷速是信息流通之根基。早於滬地開埠初期，西人即引進西方通訊方式。清咸豐十一年（1861）大英書信館、法國書信館相繼成立。1863年7月，英租界「上海工部書信館」開設，辦理本地信件之傳遞事務。1865年八月一日（同治四年六月），工部局書信館始發行郵票，其後美國、

²⁶ 見〔清〕洛如花館主人：《春申浦竹枝詞》，收於顧炳權編著：《上海歷代竹枝詞》（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2001），頁46。

²⁷ 見〔清〕招隱山人：《申江紀游》，收於顧炳權編著：《上海歷代竹枝詞》，頁69。

²⁸ 見〔清〕李默庵：《申江雜詠》，收於顧炳權編著：《上海歷代竹枝詞》，頁75。

²⁹ 見〔清〕斌椿：《乘槎筆記》（台北：廣文書局，1962《小方壺齋輿地叢鈔》），卷7，頁8644。

³⁰ 見〔清〕張德彝《出使泰西記》（台北：廣文書局，1962《小方壺齋輿地叢鈔》），卷24，頁8801。

³¹ 見〔清〕袁祖志：《西俗雜誌》（台北：廣文書局，1962《小方壺齋輿地叢鈔》），卷4，頁9669。

日本、德國、俄國陸續在上海成立書信館，然書信館之設立於約無據，亦未得中國政府批准，實是侵奪主權舉動。國內郵政方面，自清同治五年（1866）起，海關兼辦郵遞，上海海關設郵務辦事處，辦理京滬、津滬等地郵運，然業務內容狹隘，僅限於使館文件與海關本身公私函件為用。³²清光緒元年（1875）上海海關方便外國人同海內外通訊，曾於海關附設郵政部，稱「寄信官局」，專為上海僑民郵寄信札，管理上海與各國通信，強化上海與世界之聯繫。清光緒二十二年（1896）清政府正式開辦國家郵政，仿照英美方法，設置國家郵局，發行函寄郵票，令郵務網絡遍布全國。³³

新式郵務系統之學習與引進，縱使帶來便利，但開辦之初多有限制。以滬地而言，早期郵筒僅置於租界內地，發送信件僅限租界一隅。又，僑民郵件，雖由工部書信館專司收發，而外部通商各口岸之郵件，則由所在領事館代為處理，舉凡信件之投寄與領取，僑商需親赴辦理，相當不便。相較於袁祖志描繪西方城中各戶皆有信箱或置於街道，收發信函俐落，且索費廉價，更凸顯中土方面之落後，下引其言為證：

信館最大，為國家業，但向購票一角，中土謂之鬼頭，黏於信面而投於筒中，遠在他方，近在本城皆可即時到達，必無遺失。其筒置於途中，一日有人收取數次，接信之人亦不出，信資較中土為廉。³⁴

泰西諸國，信館向為國家大事，信訊交流是溝通人際往來之首，郵務的傳遞雖不若電訊般收效速及，卻是社會中斷不可缺之公眾事業，是凝繫、溝通世界的手段之一，在電訊尚未遍及之年代，其重要性不勝言喻。

相同地，自電學發展以降，電訊對人類社會之作用卓越。各國知其緊要與必要，善用超凡速率突破山川水源阻遏，紛納為國營事業，著重開發，妥切用於商業、軍事方面，收達富強施效。針對泰西諸國對電訊之啟迪歷程，1867年前後遊覽倫敦王韜做出詳盡記載：

按電學創於明季，雖經哲人求得其理，鮮有知用者。道光末年，民間試行私製，而電線之妙用始被於英、美、德、法諸國。凡商民薈萃之區，濟急傳音人咸稱便。同治七年，英議政院以電線獲賞甚鉅，遂禁私設，悉歸於官而徵稅焉。通國設局五所，以京都為總匯，內分外局五千五百四十所，

³² 見熊月之、周武主編：《上海：一座現代化都市的編年史》（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2007），頁99。

³³ 有關上海書信局與大清郵政局之發展，與發行郵票案圖與面額，詳見薛明劍：《上海早期的郵政》，收於上海市文史館、上海市人民政府參事室文史資料工作委員會編：《上海地方史資料》（上海：上海社會科學院，1984）（三），頁98-101。

³⁴ 見〔清〕袁祖志：《西俗雜誌》，頁9669。

歲稅金錢百數十萬。余至英時蓋屬於國家猶未數月也。³⁵

巍峨美奐之郵電局建築背後，隱含大英國對電報的重視，此措更教王韜折服、讚嘆，留下傳世文字：

電信總局，樓閣崇宏，棟宇高敞。左為郵部，右為電房室，各數百椽。內植奇花異草，種數繁多，幾莫能名。盆中一樹高約二尺，上罩玻璃，其葉如艾似榕。葉上生葉，攢簇茂密，詢其名曰子母數，乃從遠地攜來。總辦師蔑導覽各處，堂中字盤縱橫排列，電線千條。頭緒紛錯，司收發者千餘人，皆綺年玉貌之女子。³⁶

從硬體建築到綴點植物，以及內部作業景況，王氏以細膩筆法交代，然真正讚嘆者，恐怕是難以忘卻之郵電效率，及提供歐洲強國源源不絕之稅源。

二、馮虛御風：中國電報之設

鑽研西方傳播歷史之馬特拉（Mattelart, Armand），曾歸結下述心得：

國際傳播的歷史和它的表象是歷史的組合圖案，交織著戰爭、進步和文化以及它們之間連續不斷的相互交錯的軌跡，以及他們的流量和流量的再分配。³⁷

此處點出傳播得以延伸之三大元素：戰爭、進步與文化。其中，尤以戰爭對軍情之掌握與消息暢流為至要，關乎國之存亡，故為各國關注焦點，是推動傳播媒介精益求精之推手，從短兵交接到無形之商戰，贏得勝算者時時是把握信息者。王韜親睹電報利捷，建言中國亟宜籌辦電報以應付戰事需要：

夫電線傳遞信息最為神速，夫人之知之然，亦知海防非得此無以偵寇蹤而集戰船乎。且各國公使皆聚於京師，遇有交涉之事，辦理稍形齟齬，動輒下旗決戰，立發電音，回國調取兵船專是恫喝，若無電線則各省大吏茫然未有知。即知亦難克期集事，而倉促之際，被其蹂躪者必多矣。³⁸

王氏精粹點出中國通電不及各國之劣勢，倘兩軍欲行開戰，各省未得齊心，茫然無措，未戰先敗莫如是此。清同治十三年（1873），日本倏忽襲擊台灣，孤懸島嶼受制汪洋與颶風，斷卻與朝廷的聯繫，沈葆楨領命為主事欽差，深感電報之必

³⁵ 見〔清〕王韜：《漫遊隨錄》（台北：廣文書局，1962，《小方壺齋輿地叢鈔》）卷16，頁9836-9837。

³⁶ 見〔清〕王韜：《漫遊隨錄》，卷16，頁9836。

³⁷ 見阿芒·馬特拉（Mattelart, Armand）著，陳衛星譯：《世界傳播與文化霸權》（北京：中央編譯出版社，2001），頁1。

³⁸ 見〔清〕王韜：《設電線》（台北：文海出版社，1972，《皇朝經世文新編》），頁113-114。

要，揭示：

臺海之險，甲諸海疆，從前文報恆累月不通，有輪船後，乃按月可達，然至颶風大作時，雖輪船亦為所阻，欲消息常通，斷不可無電線 瞬息可通，事至不虞倉卒矣。³⁹

朝廷准沈葆楨即刻辦理：規模從安平經澎湖到廈門，陸路由安平到府城，此線鋪設儘管只應付一時所需，卻已證實電遞對戰事不可或缺，遂醞釀光緒年間敷設電報舉措。本著對電報之認識，李鴻章於自強運動期間，率先允許範圍內試辦三條短程電線⁴⁰，成為日後全國電線網絡敷設之張本，其中以滬地為籌辦之始，起迄由文忠行轅通至江南製造局，藉此試驗。⁴¹清光緒五年（1879）中俄兩國因伊犁交涉形成緊張事態，兩軍嚴陣以待，幸賴曾紀澤折衝有方，免去兵戎相見。此次危境凸顯中國音信遲滯弊竇，急迫外交因「電報由上海郵寄北京需時五日，復電又需五日，在冬季要耽延二五日。」⁴²曾氏畏忌北京態度，礙於聖意未達，談判進程處處掣肘，差點延誤交涉良機。時任北洋總督之李鴻章見機不可失，奏請建設電報系統，當以南北洋線為主軸，諫陳：

用兵之道，必以神速為貴，是以泰西各國於講求槍炮之外，水路則有快輪船，陸路則有火輪車，以此用兵，飛行絕跡。而數萬里海洋欲通軍信，則又有電報之法 故由各國以至上海，莫不設立電報，瞬息之間可以相互文答。獨中國文書尚恃驛遞，雖日行六百里，加緊亦已遲速懸殊 倘遇用兵之際，彼等外國軍信速於中國，利害已判若徑庭。且其鐵甲等項，兵船在海洋日行千餘里，勢必聲東擊西，莫可測度，全賴軍報神速，相機調援，是電報實為防務必需之物。⁴³

李鴻章從軍事報捷出發，剖析中國與泰西作戰勝負，取決軍機速度，文忠公提舉中俄交涉情狀以彰顯電報在外交方面之首要：

即如曾紀澤由俄國電報到上海只須一日，而由上海至京城，現係輪船附

³⁹ 見〔清〕寶鋆等奉敕撰：《籌辦夷務始末：同治朝》，卷94，頁3-6。

⁴⁰ 此三條短程電線分別是：津沽線、北塘線與滬線。

⁴¹ 一般皆以為津沽、北塘線是中國境內第一條電線，事實不然。據《上海小志》記載「中國電報於光緒初年李文忠駐節在滬，始行創辦，迄三年五月五日先成一段，僅由行轅通至製造局。」另外，姚公鶴在《上海閒話》同提此事，以為「迄三年五月五日，上海線告成，而第一次發電，則由李文忠行轅中通電至製造局，其電文為『行轅正午一刻』六字。」由是可知，至遲在光緒三年五月初五（1877.6.15）前，即台灣南部電線尚在進行之際，李鴻章已著手試行一條從行轅通至江南製造局的電線。詳見胡祥翰：《上海小志》（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頁14；姚公鶴：《上海閒話》（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頁1。

⁴² 見馬士著、張匯文等合譯：《中華帝國對外關係史》（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2000），卷2，頁370。

⁴³ 見〔清〕李鴻章：請設南北洋電報片，《李鴻章全集》冊3，頁1517-1518。

寄，尚須六、七日到京，如遇海道不通，郵驛必以十日為期。是上海至京僅二千數百里，較之俄國至上海數萬里，消息反遲十倍。⁴⁴

從俄地到上海，復由滬地至京師，回復時間反差數十倍，尤證中國舊時郵驛，應付文件往來尚可為用，及遇重大軍情確不敷使用。鑒於電線之籌議乃以保國軍需為出發，為純軍事作用之利器，自較其他建設更具優勢。繼後，李氏提出具體方案，評估安置海線費多且不易修繕，主以路線為佳。敷設路徑「由天津陸路循運河以至江北，越長江由鎮江達上海，安置旱線，及與外國通中國之電線相接，需費不過十數萬兩，一年半可以告成。」⁴⁵有關經費來源與日後管理問題，併以「官督商辦」為主，協設「電報學堂」，聘洋人教習華生，自行經理。朝廷採納李氏奏請，旋即進行中國早期最重要之電線——津滬線之辦理事宜，借勢丹籍大北公司十餘年之辦理經驗，代以解決技術、機具物料採買各細節。及至清朝末年，上海從電遞起始點，迅擴為中國電報之輻射中心，內通諸省，外繫各國：

滬上創設電報三十年於茲矣，非特全國音問頃刻可通，即東西洋各國，亦瞬息可達。蓋陸線接以竿，水線沉於海，無論水路，均可傳遞利便，洵入神矣。⁴⁶

確實，電線開通已降，取其便速利捷，流風所及，令許多機構爭驗其優勢，其中以軍事與商、報業之引用盛況激烈，尤以軍事國防方面獲得首功。清光緒八年（1880），朝鮮生發「壬午事變」，日軍趁隙出兵，幸得電報靈迅，中國適時平息內亂；又法國覬覦越南，伺機微動以期大開中國西南陸路門戶，中法戰事越演越熾。軍情緊迫時電報往來數函，軍機變化萬端，瞬息靈通，令籌範浙東防務之薛福成大開眼界，歎為：「余自此役之後，益知電報之為用於軍國甚鉅。」⁴⁷盛宣懷對電報之實效，亦嘖嘖讚嘆：「此次法人開？，數省用兵，朝發夕至，朝廷指揮軍事，萬里戶庭，機不或失，識者皆謂電線與有功焉。」⁴⁸是以，取電線之傳訊速效與機密性高，後有關洋務軍務之文報，均改由電線遞覆：

諭旨要件，當速行者，用電線發，本衙門（總理衙門）遵旨電達之件及緊要事件，亦如之 凡出使大臣，及各直省督撫、將軍、都統、欽差大臣，

⁴⁴ 同前注，頁 1518。

⁴⁵ 見《電線檔》第 218 號文，頁 262 - 264。

⁴⁶ 見《上海指南》（上海：上海商務印書館，1909），卷 6，頁 21，轉引自熊月之、周武主編：《上海：一座現代化都市的編年史》，頁 101。

⁴⁷ 見〔清〕薛福成：《浙東籌防錄》（台北：文海出版社，1973，《近代中國史料叢刊》）卷 1 上，頁 235 - 237。

⁴⁸ 見王爾敏，吳倫霓霞編：《盛宣懷實業函電稿》（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3），頁 224 - 225。

遇有緊要公事應奏聞者，准由電線逕達本衙門代奏。⁴⁹

復此，行於中國多年之奏摺制有所變革，除有原本之諭旨、奏論外，增添電旨、電告形式，至光緒二十四年（1898）進而規定，朝廷之「明降諭旨，均由電報局電知各省督撫」⁵⁰漸次取代廷寄地位，大開中國信息流通另一通衢。

三、通達：想像的共時

施拉姆（1mm）曾言：「當一個社會開始現代化時，發展的第一批跡象之一即是傳播渠道的延伸。」⁵¹上海地區憑藉私置電報之機，取其技能轉移與中西匯通地位，在瞬息萬變的時代成為電報中心自無意外，亟要者莫如電報以霎時速度，扭轉自然疆界對人類之意義，傳播中介改變著國際交流，亦扭轉人們之時空體驗，重啟對外部世界之認識。

（一）生產工業中的商業與報刊

電報之影響，除卻軍事用途，貢獻卓越者莫如厚利商民與報業對第一新聞之把握。商機無國界、時差，唯有電遞可令商人即時瞭解寰宇間市場行情之起落，及貨物漲跌，此是電線能於各國興盛之主因，更是推動中國興辦電線的主要驅動力，連帶改變中外貿易式樣：「輪船經由運河的迅速航程大大縮短冒險的時間，而電報可能已將損失的危險降至最低限度。這些條件吸引著許多過去因缺乏資本或信用而被排斥於商業之外的競爭者參加了貿易，因而刺激了貿易的發展。」⁵²當越來越多資金投到市場輪轉，意味著商業運作煥發，卻也讓上海界內之洋商起落驟遽，因電報相繼開通「雖然減少損失的危險，同時也排除了商人們所追逐的超額利潤。最低報酬的安全貿易代替了偶然的冒險。」⁵³這意味著「轉手間鉅資可致」之時代已成昨日黃花。儘管如是，然如鄭觀應所言：「竊自通商以來，泰西日富，中華日困，考其致勝之由，不外乎信息敏捷，轉運神速，洋商猛著先鞭，華商瞠乎其後。」⁵⁴從商業角度看來，外僑對貿易先機之掌握仍優於華商，此點是無可撼動之實狀。

其次，電報之存在令報業發展邁向新里程，令報刊走向現代經營，無形間促進民族——國家之凝合。早於滬上大北公司電報初設未久，重視時效性之《申報》

⁴⁹ 見《大清會典》（台北：新文豐出版，景清光緒二十五年刻本）卷99，頁1。

⁵⁰ 見〔清〕劉錦藻：《清朝續文獻通考》，卷372，頁11181。

⁵¹ 見韋耳伯 施拉姆（Schramm, Wilbur Lang）著，金燕寧等譯：《大眾傳播媒介與社會發展》（北京：華夏出版社，1990），頁83。

⁵² 見姚賢鎬：《中國近代對外貿易史資料（1840-1895）》（北京：中華書局，1962）冊2，頁950。

⁵³ 同前注，頁954。

⁵⁴ 見〔清〕鄭觀應撰：《盛世危言後編》（台北：大通書局，1968）冊3，卷12，頁7。

即刻援用，自此《申報》透過外電所接獲之新聞，甚至更迅於內地信息輾轉傳遞。同治三年（1874）5月10日發生在香港地區之地震事件，《申報》以最速件於5月12日發佈，內容表示：「接香港電報知該埠於五月初十日地震，共兩次，初次勢微人皆不覺，二次勢甚猛，凡房內各物盡皆搖動，但幸無毀損之患耳。」⁵⁵試想之，從地震發生至電遞傳輸、收復電訊、繼之製版、印刷、送達等程序僅費時二日，足見報館對資訊之掌握速度高勝往昔，其收效不可言喻。透過電報設備，泰西諸國等信息，在報上時有所見，《申報》同治十二年（1873）五月初五，刊有「法國信息」一則，開頭即說明此新聞由「頃接法國寄來電報」，內文披露法國政壇最新時事：國君遜位、大臣更替多人與國庫將罄支絀等事。⁵⁶對照數日前（五月初一日）英國來信「電報傳出信息指稱：『普國與法國用兵所費耗繁，雖已索法國補項六萬萬銀之數，乃猶不足以賠已之費也，今國庫以罄，尚無以籌支各項。』」⁵⁷恐將無以籌支各項等訊息，互文立現彼時滬處對寰宇近況之快捷掌握。由此二例可證上海與世界之接軌，更早於與內部各省之接觸。

迨中國自架電線後，《申報》為響讀者刊言：「本館因念諭旨為中國最大最要之件，聞報諸君均以先睹為快，現故不吝重賞與津友訂定，請將每日京報上諭旨，由中國新設之電報局傳出，彼此消息靈通，瞬息千里。」⁵⁸自此，京報內容可較以前提早三日發告，不再受天候、交通阻絕之苦，致令音訊滯差。具體實例為光緒八年三月初二，李鴻章著賞假一個月之上諭，於五日當天《申報》之本館自己收到電音「欄中及時刊登，此為過往未有過之敏捷。」⁵⁹有鑒報業「貴速不貴遲」之原則，《申報》不僅在傳帝國內訊息展現其雄厚能力，且對外界消息之刊登亦重迅能。舉清光緒十年1884年中法戰爭為例，《申報》藉此重大政治事件顯示即時報導之實力，戰事激烈時分，每日發佈即刻戰況，且對重要消息刊行「號外」告知。其他報業不甘落後，亦投入此番激賽，《迴圈日報》除最新戰事報導外，並針對戰況加以剖判。透過報刊即刻報導，使發生在東南一隅之局部戰爭，衍生成全國注目焦點，激起有識者之熱血情操與民族情緒，熱烈程度從讀者紛繼投書，高談時評可知：如《申報》刊載「論中國不可不一戰」（1884.7.16）、「論中國目下情形惟有一戰」（1884.7.17）等；《迴圈日報》刊登「中國不必畏法人辨」1883.9.10 與「論中國民心大可用」（1884.4.19）等文，在彼時社會不但引起廣大迴響，更呈顯讀者對資訊傳播與時事要聞立即性要求。

⁵⁵ 見「香港地震」，《申報》同治甲戌五月十二日，第六百六十一號，冊4，頁583。

⁵⁶ 見「法國信息」，《申報》同治癸酉五月初五日，第三百卅三號，冊2，頁489。

⁵⁷ 見「英國來信」，《申報》同治癸酉五月初一日，第三百廿九號，冊2，頁473。

⁵⁸ 見「諭京報貴速不貴遲」，《申報》光緒八年正月十五日，第三千一百七十二號，冊20，頁225上。

⁵⁹ 見「本館自己接到電音」，《申報》光緒八年三月十三日，第三千二百九十九號，冊20，頁545上。

（二）打破地域迷障，放足世界

施拉姆曾闡述傳播信息擴充對人類社群與文化帶來之影響，其言：

在一個完全是傳統和文盲的社會中，人的有效環境到他所能見到的地方為止，雖然有效環境也包括了由父母傳給子女，或是由教士傳給信徒的民間的智慧和宗教信仰。偶爾有一位旅行者、一位行吟詩人或一個信使帶來關於地平線以外地方的情況。有時，一個愛冒險的年輕人在好奇心驅使下親自看看在地平線之外有些什麼。但是，絕大部分時間裡，這個傳統的村莊生活在它的古老方式與有限的地域之中——「發展」開始。然後，政府、道路、學校、文化和大眾媒介侵入離開獨處的村莊，並吸引村民進入一個更大的世界。⁶⁰

大眾媒介帶來世界（外部）的資訊，這對原籍「雙腳與意志」理解、把握世界的民眾來說，不啻隱含著深刻的心理轉變。人們的生活不再單純地以地方性事件為滿足，現今呈現在人們眼前的信息，乃與外部/世界不斷湧現之危險與機會相關。急遽變化的結果，顯露相當有趣的現象：很多原屬地方的事件，現在看起來並不為要，而更多距離悠遠之事，其重要與影響性反被視為首要。恰若紀登斯辯證般：「世界性社會關係的強化：將距離遙遠的兩地以獨特的方式連結，當遠方有任何事情發生，另一地亦會因此受到影響，反之亦然。」⁶¹句中所指的獨特連結，首以傳播媒介居功厥偉。在稍晚研究中，紀氏對此定義有更詳明之論析，加深現代性擴張與全球化之互依聯繫：「全球化關注的是在場與不在場事物間的交集，即『遠方』社會事件和社會關係與本地事件的交互影響。我們應該從本地環境和事物的漫長變化，與疏離地區間的發展關係，來瞭解現現代性的全球式擴張。」⁶²若非藉由迅即之電報速度，報刊無可提供彼處立時新訊，人們無以瞭解腳蹤外的環境變化，透過電報開通，純粹的自然空間被重新置換，流動的信息改寫人們心中對距離維度，同時粉碎時差帶來之否滯。正如上述舉證的中法戰役，透過每日出刊之報紙，令遠在天邊的戰情，演變成眾人之「譚助」⁶³，中外間交戰讓讀者明白天下不再只由中國與鄰近四裔組成，而「國家」、「民族」大業的存續危亡竟與閱報者如此貼合，使人生發唇齒相依之深切體悟，更昭顯現代媒介巨大作用。

（三）去塞求通：民族向心之凝聚

⁶⁰ 見韋耳伯 施拉姆 (Wilbur Schramm):《大眾傳播媒介與社會發展》，頁 83。

⁶¹ 見 John Tomlinson 著，鄭榮元、陳慧慈譯：《最新文化全球化》，頁 52。

⁶² 同前注。

⁶³ 「近以法構釁，中朝決意用兵，敵慨之忱，薄海同具。好事者繪為戰捷之途，市井購觀恣為譚助。」原文出自尊聞閣主人：敘例，《點石齋畫報》，轉引自阿英：《晚清文藝報刊述略》（上海：古典文學出版社，1958），頁 92。

康有為針對晚清頹敗概括：「中國百弊，皆由弊隔」⁶⁴，「弊隔」之主由為「上下隔塞，民情不通」⁶⁵，形成此病之因有二：一方面礙為體制尊隔，官僚體系罔顧民意，令「小民冤抑而未由呼籲」，繼之「故君與臣隔絕，官與民隔絕，大臣小臣又相隔絕，如浮屠百級，級級難通，廣廈千間，重重並隔。」⁶⁶造成君臣相隔，形同塊壘；另一方面礙於遼闊幅員所帶來之滯礙，遂使民情壅閉。康長素以為，引進西方鐵路、電報、郵政、報刊之技術，將有助破除有形障蔽，令民意直入上聽，俾使「設郵政行局以官領之，遞及私書，給以憑樣，與鐵路相輔而，消息易通，見聞易廣，而進坐收千餘萬之款，退可省三百萬之驛，上之利國，下之便民」廣開報業，方可收成「通古今，達中外」標的。⁶⁷其後，梁啟超延續相同理念，陳明中國痼疾與受侮數十年之遠因，與上下蔽塞攸關，欲去塞求通「厥道非一，而報館其導端也」，理由為：

夫今萬國並立，猶比鄰也。齊州以內，猶同室也。比鄰之事，而吾不知，甚乃同室所為，不相聞問，則有耳目而無耳目，上有所措置，不能喻之民，下有所苦患，不能告之君，則有喉舌而無喉舌，其有助耳目喉舌之用，而起天下之廢疾者，則報館之為也。國家之保護報館，如鳥鬻子，士民之嗜閱報章，如蚊附臄，閱報愈多者，其人愈智。報館愈多者，其國愈強。曰：惟通之故。⁶⁸

對任公而言，報館不僅肩負開民智大任，且報館數目多寡，但與國勢衰強有直接干係，因它喚起千百萬民眾對國之向心，體認國之興亡，匹夫有責之重責。何以從康有為至梁啟超，皆視「通」「透」與否為國力強盛不可或缺的必然條件？答案或許可由安德森對民族主義之詮解尋求端倪，其在卓著《想像的共同體：民族主義的起源與散佈》另闢蹊徑，直言：民族作為一種想像的、有限的、具有主權的共同體，其文化根源來自維繫傳統秩序的三種文化概念（宗教共同體、王朝權威、傳統世界觀）的崩解，這種改動首先發生在西歐，繼而傳播至世界各地。而「民族」作為補添此空缺的想像，必藉助與資本主義結合的印刷出版業，再將宗教消解後的「博愛」(fraternity)、王朝消解後的「權力」(power)，以及一種新的空洞而均質的時間觀，有意義地接合，復以新的方式思維自身與人群之間的關係，營造出一種「水平—世俗—同時」(horizontal—secular,transverse—time)共同

⁶⁴ 見〔清〕康有為：《康有為政論集》（北京：中華書局，1981）上冊，頁159。

⁶⁵ 見〔清〕康有為：《康有為政論集》上冊，頁134。

⁶⁶ 見同前注。

⁶⁷ 見〔清〕康有為：《康有為政論集》上冊，頁126、131。

⁶⁸ 見〔清〕梁啟超：《論報館有益於國事》，《梁啟超全集》（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冊1，頁66。

體之形塑條件。⁶⁹安德森雖以民族起源與散佈為主題，然在建構民族概念與擴散模式之餘，實際上以暗指「現代化」、「新式傳播媒體」與「西方概念的引入」三者間緊密又複雜難理的糾結關係，故意圖表示「當西方的思想概念伴隨著現代化之腳步引入其他地方的同時，新式傳播媒體不僅是路徑，本身扮演了形塑者的決定性角色。」⁷⁰任公急走相告，宣傳呼籲中國應效法西人辦報，上從國之要事、社會要聞、格致新造與專門之業，通通藉由新聞佈告天下人民，與眾共悉。如法勵行，十年後報館漸備，人才漸出，風氣漸開，國體大備。自此角度觀之，仿行西方設報輿論，以開民智、起民意，中國確實走在一條效行西方現代化之路徑，而新式媒體正演繹著形塑要角。透過新式報刊（傳播媒體）之展現，有識者將此論題提昇至極高、全球性的層次：新式傳播媒體在中國成為打通各階層屏蔽之利器，提供發佈新思潮之平台；若置於全球框架下，它開拓中國與世界對談、接觸之渠道。⁷¹於是，中國納受西方傳播工具，及伴隨而至之新式群我概念，隨電報之開通成為可資動員本國人民之利器，且於涵養吸納同時，將自身投入全球性的、以民族國家為單位的列國制度中，體驗共時想像。

第二節 列子御風：鐵道

關於傳播科技瓦解了時間與空間，維希留（Paul Virilio）曾寫道：由於科技「陸地已經失去了地理上的基礎，而由類似即時全球傳播體系的電訊陸地（tele-continents）所取代。」⁷²誠然如是，十九世紀消解時空者，除傳播科技之生發外，另一對時間觀/秩序帶來革新者，莫過於新式交通運輸之興起，特別以火車為首選。一如所知，空間中物體位移主要透過兩種形式，其一是自然界之運作：如天體運行、河水潺流；其二就是交通運輸，而時間則是用以表現物體空間位置變動之計量準則，故交通與時間有著相互依存的聯繫干係。

同樣是發軔於十九世紀初的產業，蒸氣機的出現補強馬匹運輸動能，終至全然取代獸能。數學公式表現：時間等於距離除以速率。速率受到動能激增之影響，成正比增生；兩地往來的時間銳減，感覺上距離亦隨之縮短，新方法與觀念以不同速度，殊途同歸地締造人類對時空之新解。西元 1829 年，英國史蒂文生利用蒸汽原理創出每小時能牽重四十噸、歷行三十五英里之機動車（車名為「火箭」

⁶⁹ 此處所謂的「水平」乃相對於傳統王朝集權中央的權力關係；「世俗」則是相對於宗教的神聖宇宙觀；「同時」使相對於傳統時間觀賦予時間各種特殊之意涵，而在其設計下，時間不能是一種透明（transparent）的、空洞的介質，詳見班納迪克·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著，吳叡人譯《想像的共同體：民族主義的起源與散佈》（台北：時報文化，1999），頁 49。

⁷⁰ 見李仁淵：《晚清的新式傳播媒體與知識份子：以報刊出版為中心的討論》，頁 83。

⁷¹ 同前注，頁 85。

⁷² 見 Schirato, Tony, Webb, Jen 著，游美齡、廖曉晶譯：《洞悉全球化》（台北：韋伯文化國際，2006），頁 75。

Rocket)，當刻超越人類自始以來之行徑速度，贏得競賽獎金五百英鎊。此後，海陸旅行速度成幾何級數遞增：四倍、八倍至百倍。文化史家艾佛岱（William R. Everdell）於著作《最早的現代人》（The First Moderns）中，將此種速率變革稱為「變化速率中的變化。」⁷³稍晚，赫胥黎發表《時間與機器》（Time and Machine）一文確指稱：「瓦特與史蒂文生發明鐵路機車，成為時間的發明者。」⁷⁴鐵路的興盛，加速英國團結於皇家天文台（Royal Observatory）的標準時間下，亦加速全球時間標準化之步調，改變人們生活中對時間節奏的感知，擴大人們的活動半徑，新式交通工具甚至成為某一特定時間之象徵。

一、中國鐵路事業之艱難開展

中國鐵路事業興起，與其他新興產業雷同，是內、外兩方壓力擠壓的結果。前者為外人冀望擴張在華商業利益的企圖，後者為國人力圖自強之索求。自五口通商以來，上海一隅商務日盛。清同治二年（1863）該處二十七家外商（主以英商居多）聯合向江蘇巡撫李鴻章請願，要求建造從上海貫至蘇州，約莫八十英里長的鐵路建築權限，文忠公評斷以為此舉涉嫌侵害中國主權，嚴加峻拒。清同治四年（1865）英商杜南特於北京宣武門外鋪設小鐵路里許，以小火車駛其上，迅疾如飛茲以宣揚，後因「見者詫異，謠誑紛起」，遂由京師步軍統領勒令拆除。⁷⁵同年，上海英商聯結若干組成吳淞鐵路公司（Woosung Road Company），擬由上海至吳淞修築一段鐵路，溝通上海與長江等地，同樣遭受中國政府嚴正拒卻。清同治十一年（1872）年，外商再次籌議建設自小東門碼頭至同和祥碼頭間鐵路，且藉助媒體宣導力量於《申報》鼓吹、舉列建置鐵路對中國之益處⁷⁶，最終仍慘遭主事官員駁斥，此議復流徒然。

鐵路運輸之利，尤與國防密切配合，中國少數人士早有所知。李鴻章於致友人函中明言：「電線由海至滬，似將盛行中土，若竟改驛遞為電信，土車為鐵路，庶足相持。」可惜彼時風氣未開，以致「聞此議者？不咋舌。」⁷⁷明證朝野人士之保守態度。清同治十三年（1874）海防議起，李氏見勢上奏，直言：「軍情瞬

⁷³ 見克拉克 布列斯（Blaise, Clark）著，范昱峰譯：《尋找時間的起點》（台北：時報文化，2003），頁24。

⁷⁴ 同前注，頁23。

⁷⁵ 詳見〔清〕徐珂：《清稗類鈔》（台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冊13，頁6093。

⁷⁶ 造鐵路告白 節錄部分原文為：「現在上海一隅，來往行人日多一日，其最熱鬧之處，如小東門碼頭過金利源海關、蘇州河，一直到同和祥碼頭沿浦一帶，過客多坐小車，風雨塵沙，殊苦顛頓，且索錢無藝較他處為猶貴。為此，有幾個外國商人，他想用西車之式，先造鐵路以便馳驅，其車中箱甚寬，上有帷蓋，一車可坐三四十人，堅固輕便。一車之成可數百年，較之小車更為便宜，與中國人亦大有益處。」見 造鐵路告白，《申報》大清同治壬申年三月二十五日，第二號，冊1，頁7下。

⁷⁷ 見〔清〕李鴻章：復丁雨生中丞，《李鴻章全集》冊6，頁3532。

息變更，倘如西學辦法，有電線通冒涇徑達各處海邊，可以一刻千里；有內地火車鐵路屯兵於旁，聞警馳援，可以一日千數百里，則統帥尚不致於誤事。」⁷⁸在眾位朝臣反對下，此番奏議亦無結論，馴後數年間，朝中鮮有人士願意再談論鐵路事宜。

二、上海經驗：鐵道之便

適值朝野靜默時期，清光緒二年（1874）年上海吳淞鐵路公司，重新籌擘連結吳淞口港口與上海租界間之鐵路，以節省成本，方便運輸貨物。⁷⁹與前次交涉結果相同，地方官員仍奉行禁止方針，嚴正拒絕。英商改變名目，以修築馬路為由，強行私造鐵路，1876年4月完成小段路軌，先以一節貨車托運石礫，一日復行數回，一時傳為奇聞，引起大小居民前往觀看。《申報》評論文章慨言：「天下之事，但聞其名，未見其實，鮮有不震驚其事之難成，疑訝其法之有礙。一旦躬親遇之，而後知其平淡無奇，並不覺其怪異可駭。始歎中西之制作雖殊而求其利便於人世則同。如上海今日所造成之火車鐵路是也。」⁸⁰此文對於描述滬上人民初見火車之感，或有言過其實之嫌，畢竟人們對新奇事物，初始定存訝異、驚懼情懷，必待觀察數時，知其無礙，方可領受其利捷與優勢，但其文描摹人們歡迎、廣納便利器物的心境轉折，恰如其份。1876年6月30日，淞滬鐵路上海至江灣段告竣，試行通車，全長五英里，火車七節長，一次可負擔一百五十人。當日鐵路公司向中西客商，發出千餘張招待券，邀請人們免費體會，作為宣傳。7月2日招待華人試乘，其中包括《申報》之主筆文士亦受邀乘坐，次日筆潤 記華客初乘火車情形 一文，為前日體驗留下史證：

俄聞放氣聲，在旁之西人亦吹口號，車即搖搖前行。初猶遲，嗣即逐漸迅疾，但聞轍軌摩蕩聲甚厲，而人已如電掣飆馳隨之以去矣。乘者、觀者一齊笑容可掬，嘖嘖稱嘆，而以為得未曾有。計一刻五分久，行至江灣，彼處人已眾多 至三點半鐘仍乘之而回，比到虹口，則人已雜遝，蓋皆欲往江灣也。頃刻間五車坐滿，並有中立於車廂內者。⁸¹

對乘坐火車者，「電掣飆馳」是亙古未有之新奇體驗。對林立兩旁、爭競觀賞的民眾而言，火車飛奔行徑樣貌，亦在所有人心中留下難以抹煞印象。

⁷⁸ 見〔清〕李鴻章：《籌議海防摺》，《李鴻章全集》冊2，頁1073。

⁷⁹ 詳見 吳淞口建造火車鐵路以達上海說，《申報》大清同治甲戌年正月初十日，第五百五十九號，冊4，頁169上。

⁸⁰ 見 觀火車鐵路記略，《申報》大清光緒丙子年三月十四日（1876.4.8），第一千二百一十一號，冊8，頁317上。

⁸¹ 見 記華客初乘火車情形，《申報》大清光緒丙子年閏五月十二日，第一千二百八十四號，冊9，頁5下。

（一）行有定時：交通時刻表

1876年7月3日火車正式營運，「吳淞道路有限公司」正式發佈火車時刻表：明訂每日開行六趟，每逢星期日特定班車未駛，開行時間以新式鐘點釐定，票價分列：頭等收洋錢半元、二等洋錢二角五分、三等收制錢120文。正式發文中，透露重要線索：首先，定時的列車、班車週而復始，它們以鐘點時間標示，其意義就像擺動之時鐘般，成為人們心中定制的時間表。小火車每隔二小時一班，全日概分早、中、晚班，隱然成為人們計時的替代性時鐘。如同今日對大眾運輸工具的理解，火車起迄皆有定時，與之相關的配套措施：運行客貨車次、停靠站點歷時，全賴精密算計可成，形成全備秩序。人們為了配合運輸時間，必須對自身之作息做出調節、轉換。新式時間透過交通運輸滲入日常生活中，固定的班次讓人們學習等候、依時，標準時間成為近代新度衡。⁸²

火車營運後，因人們對火車之便產生信賴，故乘者極多，迴響甚大，列車行運日日客滿，假日時更是一位難求：

上海至吳淞新築之火車鐵路為向來所未有，誠一大觀也。車輛往返每日六次，而客車皆擁擠無空處。即城內終年幾不出門外半步者，聞有此事亦必攜家眷一遊。鐵路停車之旁素本冷寂，現在馬車、小車來往不絕，竟變成熱鬧之區矣。予於初次開行之日登車往遊，惟見鐵路兩旁觀者雲集，欲搭坐者已繁雜不可計數，覺客車實不敷所用。⁸³

火車的新鮮感吸引民眾前往觀賞，倘能親自體味更為一大樂事。對多數民眾來說，初來乍見新奇物事，難免心存猜忌，觀望成分居多，待時日一久，時聞報刊稱道，以及旁人分享，不免躍躍欲試，如每日通勤於上海與吳淞兩地人士，初以獨輪車代步，往往身勞體疲、費時難耐，乘歷火車後萬分欣喜，投書分享：「一經上車，不轉瞬而輪動如飛，快然遄行，其價則較小車為廉，而其舒服不啻十倍，速則且不只十倍焉。」⁸⁴在價廉、舒適、速度快捷三重考量下，多項優點令火車成為民眾歡迎之具，吸引益多人民青睞。是故，隱藏在運輸器具背後的時間制度，始向基層滲透，向每位搭乘者傳遞，讓人們在接觸歷程中，具體深化對時間的了解與遵從。職是之故，清光緒年後，上海「自輪船、火車通行，往來有一定時刻，

⁸² 事實上，近代新式交通工具之行運，皆有一套縝密的時間表。從早期輪船到穿梭於市區的電車、往來兩省間之公車系統，全然如是。此些紛起開通的運輸工具，皆具縮短里程、爭取寶貴光陰諸項優點，早於1866年，沿海與內省即出現「各省商販貿易，亦皆乘坐輪船，以取迅速」之景況，是以，往來行車定時，成為準時抵達目的或爭取時效首要/必要條件。

⁸³ 見《民樂火車開行》，《申報》大清光緒丙子年閏五月十九日（1876.7.10），第一千二百九十號，冊9，頁29上。

⁸⁴ 見《論華人積習之難化》，《申報》大清光緒十二年十一月念三日（1886.12.18），第四千九百一十四號，冊29，頁1049上。

鐘錶始盛行。」⁸⁵新式交通做為觸媒，加速人們對鐘錶器物之依賴，對生活時間與鐘錶時間做出調合，明證鐘點時間已成為人們要進入參與到現代生活中賴以遵行之新範式。

（二）電掣飄馳：曇花一現的快速經驗

然而，這段令上海人倍感新奇、便捷的火車，因是英商違背中國官方禁令私自築建者，且於通行期間曾發生意外事故，地方譁然，民情激憤，政府以此為藉與英方交涉，在南京訂立購路條款，由中國分三期付款買斷路權，在款項未清的一年內，鐵路使用權仍歸英商所擁。於此期間，民間輿論四起，紛於《申報》進行呼籲：「上海至蘇州今須一日二日可到，年餘之後，火車路既成，則三點鐘之久已可到矣，豈不便於各商客之大舉耶！總之，火輪車路一舉原為大益於國之事，苟創設一路於一國，其必欲另闢別路，亦理之必然也，泰西各國無不如此，今中國亦未始非循此常例也。」⁸⁶以為築關鐵路通絡已屬全世界趨勢，中國必行起仿之，無有不跟進之理，是以，這些議論，反映滬處居民已將鐵路的存在視作必然之舉，不少商賈因親歷火車之便，遂希冀中國政府收購鐵路後，能自行經營並擴築至蘇州等地，加強聯繫通衢。天下事往往不遂人意，清光緒三年（1877）中國官方甫接手滬上鐵路，即下令著刻拆毀任其鏽蝕，令這條鐵路之命運有若曇花一現。

同電報發展有著相通命運，中國鐵路之肇興過程曲折蜿蜒。同樣是軍事運輸需求，引起朝中官員次第思索鐵路存在必要。清光緒六年（1880）中俄交涉，奉敕官員深感泰西屯兵、運輸會合之速，端賴鐵路之建，紛起陳言，其中當以李文忠公為表率：

各國所以日臻富強而莫與敵者，以其有輪船以通海道，復有鐵路以便陸行也。中國與俄接壤萬數千里，向使早得鐵路數條，則就現有兵力儘敷調遣，如無鐵路，則雖增兵增餉實屬防不勝防。蓋處今日各國皆有鐵路之時，而中國獨無，譬猶居中古以後而摒棄舟車，其動輒後於人也必矣。⁸⁷

一方面鼓吹鐵路九利，舉列築建鐵路對國計、軍政、京師、民生、轉運、郵政、礦務、招商輪船、以及行旅之助益，另一方面逐一駁斥反對者之理由。與此同時，以《申報》為代表之上海大眾輿論同以堅決立場，積極支持鐵路興建，且與洋務政要強調鐵路的軍事用途殊異，更多是強調鐵路對富民、發展工業之裨益。揆諸

⁸⁵ 見黃葦、夏林根編：《近代上海地區方志經濟史料選輯（1840-1949）》（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頁343-344。

⁸⁶ 見續議聞火車路至蘇州，《申報》大清光緒丁丑年四月十六日（1877.5.28），第一千五百六十號，冊10，頁481下。

⁸⁷ 見〔清〕李鴻章：《妥議鐵路事宜摺》，《李鴻章全集》冊3，頁1554。

歷史，清光緒四年（1878）北洋大臣李鴻章以探勘、運輸開平煤礦為由，委派上海招商局總辦唐廷樞採西法鑿井取煤，成立開平礦務局。由於載運煤礦需求與軍備所需，遂集資籌建中國第一條自辦鐵路——唐胥鐵路。鐵路初成時，恐民驚懼，下令由驢馬代替機車拖拉貨車。直到李氏邀請諸多貴胄參觀試行後，方准正式起運。

中法戰後，朝野意識到鐵路之重要，李氏趁勢奏請將鐵路事務劃歸海軍衙門統理，鐵路與海防遂為兵防發揚焦點。及至滬處，在吳淞鐵路拆毀二十餘年後，清政府復從上海至吳淞間修築溝通鐵道，於1898年9月1日通車，是人們所習知的淞滬鐵路。從初期之吳淞鐵路至後期淞滬鐵道之開通，上海居民概不陌生，有人以前、後竹枝詞表示對舊鐵路之懷想，及對新鐵路之歡迎：「火車當日達吳淞，女伴遨遊興致濃。今日司空都見慣，滬寧來去也從容。」⁸⁸繼言「淞江鐵路已開通，振翮雲間頃刻中。行見滬杭車道接，吳娘越女鬥豪雄。」⁸⁸由於上海市民率聞風氣之先，曾有一段切身嘗試之經歷，類似比對言論時見於街談巷語與報章論壇，對於鐵路之殷切期待與好感，逐步在上下居民心中達成共識。與鐵路相關聯的思維，及生活方式亦逐漸在民眾心中生根。

三、難以輕忽的存在：「標準時間」與火車

做為工業文明產物之新式交通工具—火車，以其特有的速度、規則與效率，駛向現代人之生活。興築鐵路、鋪設電報路線，首重建立統一的標準時間，以調和各地時差，統合運輸效能。早於1840年代，泰西各國即捋臂張拳地發展鐵路輸送。鐵路控館員利用初發明的電動警報器以控制複雜的網絡交通，避免誤點、會車遲緩、車禍與調度不及。類似行制，王韜曾詳細描述1860年代末葉，於倫敦所見的火輪車及執掌模式：

泰西利捷之製，莫如舟車。雖都中往來，無不賴輪車之迅便。其制略如巨櫃，左右啟門以通，出入中可安坐數十人，下置四輪或六輪不等。行時數車聯絡，連以鐵鉤，前車置火箱，火發機動，輪轉如飛，數車互相牽率以行。其行，每時約二百里或三百餘里，轍道鑄鐵為渠，起凸線安輪，分寸合軌，平坦堅整，以利馳驅，無高低凹凸、欹斜傾側之患，遇山石則關鑿通衢大道，平直如砥。車道之旁，貫接鐵線千萬里不斷，以電器祕機傳達言語，有所欲言，則電氣運線，如電氣之迅，頃刻千里有如覲面晤對，呼應問答，其法精微，有難析述者。兩車相遇，猝不及避，有撞裂傾覆之虞，故凡往來起止預有定期，其當車路要衝，置驛吏郵役，晝夜守立，嚴

⁸⁸ 見朱文炳：《海上竹枝詞》，收於顧炳權編著：《上海歷代竹枝詞》，頁203。

謹值班，須臾不懈。⁸⁹

其中「電器祕機傳達言語」即是藉助電報通訊以指揮火車行徑制度。火車初行之時，由於各地時間不同，鐵路意外事故無日無之，即使安排守備員指引，亦時聞交通變故生發，無可避免的徵象皆源自同一鐵道火車，採用不同的地方時間，致令電訊通報與鐵路體系紊亂不一。彼時的實況是：每個城市皆有自屬的官方時間，導致數哩外的城鎮在時間上可能就落差十五分或三十分，為使用電報系統維持秩序，每條鐵路雖將本身路線的時間劃一，免除混淆與避免不測，但不同鐵路的鐵道時間仍不同，為所有旅客帶來困擾與不便，缺乏統一的時間標準成為拓展交通網絡的一大夢魘，令各地遲遲無法建立行之有效的運行時刻表。鐵路業者認為唯有將全世界時間皆置於同一象限，以期使用一種計時方法即可獲知別地時間，使時間在同一計時下獲得置換，方為解決之道。1880年，英國國會議決以格林威治時間為全國標準時間。1884年，在華盛頓召開之「國際子午線會議」（International Meridian Conference），首次針對全世界訂立劃分時區辦法：全球被劃分成二十四個時區，每個時區間相差一小時，一天的精確始點自此獲得固定。初次行使，某些國家的鐵路與運輸時間表搭配得宜，但在少數國家仍屬混亂。以美國來說，現有四個時區，然遲至在1870年，約莫還存在八十多個不同的鐵路時間，直到1883年各地甫達成相同共識。於是，近代交通工具之生發，最大貢獻在於催化統一標準時間誕生。易言之，近世鐵路互換性和時間標準化的關係緊密，且相互依存，鐵道之存在如同「一個血管叢，一個真正的血液循環系統，非常複雜，既分又合，如樹枝分叉，分裂著、延伸著，張開觸鬚、旁枝、主根、支線」⁹⁰既迅速且有計畫地順著鐵軌與儀表、運費與薪資，使各地時間漸次脫離「自然」的管控，讓旅行行程與通訊時間成為推動全球化之主力，加速時間標準化進度，於是「由於中古歐洲發明並啟用的鐘錶所產生西方特定的時間制度，成為世界性的時間計量標準。它的獨霸性發展象徵了世界其他時間不可避免的凋零。」⁹¹誠如所曉：當鐵路和電報科技將世界依時區重劃時，劃分各方領土之行動，早已隨霸權文化流竄於世界各角落，新科技不僅攸關社會進步與變遷，也與時空概念的形塑、重組劃上等號。

四、球制空靈可驗時：氣象、交通指標

隨著標準時間的出現，「時間」再次被當作商品般轉售。1881年，多數歐洲

⁸⁹ 見〔清〕王韜：《漫遊隨錄》卷16，頁9836。（強調處筆者所加）

⁹⁰ 見（英）吉登斯（Giddens, Anthony）著，胡宗澤等譯：《民族－國家與暴力》（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98），頁216。

⁹¹ 見Tomlinson, John 著，鄭榮元、陳慧慈譯：《最新文化全球化》，頁56。

國家皆根據主要天文台設立的標準時間定時。在美國，天文台把精確時間訊號送往西方聯合公司與各鐵路單位；後者再把時間訊號利用報時球轉賣各城市、企業與私人公司。時間為經費不足的天文台帶來豐盛利潤，西方聯合公司亦大發利市。儘管中國主要鐵路幹線以南北向為主，受時區的影響相對微弱。⁹²然而，有趣的是，伴隨世界標準時間逐一成形，清光緒十年（1884）前後，上海同步出現天文氣象站。此站由上海海關出資，在法租界外灘設置一木結構之氣象信號台，透過高懸不同旗幟，負責公佈每日氣象預報並核對時鐘，相關種種透過《點石齋畫報》留下彌足珍貴之情影與文字說明：

本埠法租界外灘外洋涇橋墩於秋間新製驗時球與報風旗。按旗於每日之上午十點鐘扯起，遞報吳淞口外風信，其視風之所向或大或細或晴或雨，隨時改懸，各旗傳報至。球則每日十一點三刻鐘時升起半杆，十一點五十五分鐘升至杆頂，至十二點鐘，球即落下，以便居民驗對時刻，允稱奇制。

93

圖制中清楚可見，信號台上主建築有一木杆，頂端暗設風向儀與風速儀，風速儀下懸一大球，是報時所用之「驗時球」，建築構造相形簡單，但它誠是上海地區最早的氣象預報台及標準時間對時鐘，是聯繫時間、氣象與交通間主要機關。

由於時間標準化是複雜的抽象化歷程，在實質上牽引著商業活動，需提供「立即性」之調和，另方面涉及公共事業營運之通達：標準化時間令鐵路行駛無礙，且對氣象預報貢獻卓越，專業的氣象觀察員，必須廣搜每小時百哩或數千哩遠外各地區資訊，再逐步將地區時間換算為單一的「即時」時間，以利追蹤暴風的鋒面與天氣瞬變之流動。於此情況下若缺乏標準時間，將增添氣象預測之難度，其準確程度亦大打折扣，難以服眾。滬上竹枝詞亦存有類似紀錄：「球制空靈可驗時，日中升降後無差。報風還把天機測，晴雨分揚各色旗。」⁹⁴底下附有微字說明，其文與《點石齋畫報》異曲同工，差異不遠。上海報午時及風信標記專例劃定，報時、報風的專例記號：首先報每日之的確午時，「的確午時」就是標準時間，並規則每日上午九點半、下午三點四十五分回報大戢山洋面上午九點、下午三點的風霧情形，復於次日上午十點通報沿海一帶全日（二十四小時）內風力、風向情況。⁹⁵在此方面，上海幾乎與世界各大城市同步，為宣傳標準時間不遺餘

⁹² 見克拉克 布列斯（Blaise, Clark）著，范昱峰譯：《尋找時間的起點》，頁 214。

⁹³ 見黃勇編著：《回眸晚清：點石齋畫報精選釋評》（北京：京華出版社，2006），頁 50。

⁹⁴ 見〔清〕浙西惜紅生：滬上竹枝詞，刊載於《申報》1885 年 1 月 28 日，署「浙西惜紅生」。文前有序云：「僕肄業鹽官，客遊滬濱，印尋鴻雪，俄驚星次，將周景鶴少似覺風光照易，就見聞之所及，聊掇拾以為辭。信口吟來，不免頗多鄙俚；吮毫寫去，無非屬新奇。權當吳謳，錄請鄂政。」作者真實姓名、生平事蹟，詳待考證。收於顧炳權編著：《上海歷代竹枝詞》（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2001），頁 412。

⁹⁵ 見上海報午時及風信標記專例，上海徐家匯天文台編印：《報風要則》，光緒二十三年版，

力。

時至民國後，標準時間由政府決定與傳播，且於各個重要中心點設訊號站，散播準確時間，與時間關係密切的交通運輸和公共時鐘，皆由訊號站利用電訊操控力求一致性。1927年9月，中國第一家由交通部正式登記成立的北平廣播電台，於「交通部北平廣播電台 XGOP 播音節目表」(14:30-24:00)，排定每日從 20:14-20:16 傳送時刻氣象單元，規定以北平市政府標準時為準繩，於夜間八點依刻校對時刻時間。⁹⁶

五、時間節奏：急速的腳步韻律

曼福德 (Lewis Mumford) 言述：「工業時代的關鍵機械 (Key-machine)，不是蒸汽引擎，而是鐘錶。」⁹⁷近代一切的發明與生發，以及人類對時空體驗之扭轉，皆與時間變更相關。近代生活皆以效率為優先考量，而效率則藉由時間予以標度、守護，鐘錶同時成為時間的管束者、仲裁者與捍衛者。藉由人們對運輸工具的仰賴，新式運輸用具由於運行時間上相對固定，遂培養人們建立「時不我待、過時不候」之守時觀念，趕火車、趕電車、趕輪船，成為生活中的重要內容，新式交通工具不但是人們加以追趕、恭候的對象，更是現代社會中以直線飛奔的時間隱喻。

交通工具異常精準且確定的時間點，使時間從過往的模糊意識轉為精確之節點，精確化、程式化與具體化的時間特徵，無時無刻不刺激、鼓動著人們，予人緊張、緊繃的感受，此與近代交通工具攜來的速度感恰成正比。易言之，與其說新式交通工具令兩地距離頃刻貼近，不如說近代傳輸系統為人類攜來快節奏的時間感知，讓人無法倖免於外。根據現代化精神的想像，理性的人類在高效率的空間中遊移走動，越來越精確的發車時刻、越來越具體之路線牌站，將車次有條不紊地予以排列。精密規劃的營運流程，令彼此緊密相繫，如果哪一個環節脫軌了、跳針了，其後所有班次將若骨牌效應般，產生無可抑制之連鎖反應，打亂整體運作常規，影響所及不容小覷。如以比喻方式將懸於工廠內部之大鐘視作嚴苛的獨裁者，則隨交通工具走入千家萬戶的時間/鐘，將成為聲聲督促的催魂者，「準時」一詞不再是相對標準，反為絕對標準，讓人無法冷視其存在，成為現代社會與傳統社會間，別具關鍵的差異與分辨。

頁 1-3。轉引自丁賢勇：新式交通與生活中的時間：以近代江南為例，《史林》(上海：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2005)第4期，頁101。

⁹⁶ 見「電政篇」，交通部年鑑編纂委員會：《交通年鑑》(南京：交通部總務司發行，1935)，頁394、396-397。

⁹⁷ Mumford, Lewis: *Technics and Civilization* (New York: Harcourt, Brace and Company, 1934), pp.14.

第三節 風俗之飄轉豹變

「風俗」一詞究其本意，係指特定歷史時期內，人們在社會物質文化與精神文化流變中所形成的各式行為、習慣。其中，既包含歷代相沿、積久遂成的文化傳承，更有隨時代變遷而增生之新風尚習俗，具有融合承傳性、變革性與創新於一體之多面特性。社會環境之變動，特別是社會制度與經濟狀態之變革，往往引發生活觀念與社會風俗慣習之更迭，正如西漢經學家劉向所謂：「世異則事變，事變則時移，時移則俗易」⁹⁸點出「變風改俗」之背景往往同社會更迭有密切聯繫。

中國歷經多次改朝換代，繼而在社會風俗方面，有著不一的影響與轉移，然而此些蛻變皆屬「傳統中的內變」，意味社會風俗儘管在踐行式樣、行為方面各有革新，然多保留對傳統一貫之承襲與脈絡。1840年中西交匯，時局之動盪、社會之嬗變，無可避免地為中國社會迎來不一樣的思維形式，東西間之往來，令中國民眾見識到泰西社會優長一面，繼而對本有之社會風尚，注入截然不同之作用，如馬克思所言：「所有這些破壞性因素，都同時影響著中國的財政、社會風尚、工業和政治結構，而到1840年就在英國大砲的轟擊之下得到了充分的發展。」⁹⁹此時社會的變化，已躍升為古老習俗與文明、傳統元素與外來文化的衝突、磨合，比照往昔呈現更龐雜之態勢，此從上海一地之交融，看得至為明顯。

一、傳統之民情風俗

(一) 以「農時」並進之歲時、曆法

做為中國古代文化生成之重要部分，歲時文化的出現，及其對社會運作的維繫力道，崇高性不容渺視。歲時文化產生的基礎，端賴完整曆法之出現。中國社會以農業生產為宗，依天氣節令變化指導農事生活與生產向無疑義。古殷商時期，先人依日、月象之變化，推算春秋往復之規律，定下一套兼顧太陽與月亮運行為主之完整曆法，是後世習稱之「陰曆」。在此以前先民為祈求風調雨順、物產豐厚之各種祝禱儀式、活動，漸被納入曆法中，成為最早之節日。戰國時期，進步的天文觀，使農時所需之二十四節氣漸次建立。二十四節氣不僅直接指導農業，且對歲時、節日民俗之形成起著必要作用。農時計時法的確立，在中國兩千多年的歷史中，一直為廣大民眾沿用，加上一代代人民不斷賦予它們新的文化意

⁹⁸ 見〔漢〕劉向：《說苑 雜言》（台北：中國子學名著集成編印基金會，1978），卷17，頁527。

⁹⁹ 見中共中央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著作編譯局譯 中國革命與歐洲革命，《馬克思恩格斯選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卷2，頁3。

涵，令其內容更加豐裕、有趣，儘管節日不斷增衍，但其基礎架構端賴農時、曆法支撐。舉凡中國較重要之節日，如：春節、元宵、立春、龍頭、上巳、寒食、清明、端午、曬蟲、乞巧（七夕）、中秋、重陽、下元、臘八，大致都與農事活動有關，是「農耕活動的推移」。

又，中國民眾向來對自然萬物抱持敬畏心態，多將農作生產之順利與否，歸咎天恩浩蕩。加上漢朝在大一統框架中，將自然之生成變化以及對社會各種現象，一致納入天人交感之世界圖式，以陰陽二理規律解釋世間萬事之生滅，並將易學之陰陽象數納入歲時曆法領域，更加重歲時節日在人民心中之神秘及神聖地位。於是，歲時節日成為中國民眾用以承傳歷史、認同文化之標的：節日提供家庭社會交流之機會，成為人們用來聯繫、聚凝家族、民族感情之根基，歷代天子則藉此展示對天地敬重之情。許多歲時節慶常與民族之祖先、先賢、英雄之事蹟相糾合，每度一回年慶，即加深一次對民族之緬懷，成為文化延續、認同之載體，歲時節日對中國文化之重要與必要，由以示曉。

（二）與世界同步立足：改曆改元

中國歷史上，頒曆向來是朝廷專擅「時間」之權力表率，舉凡改朝換代或帝王更替，皆透過改換紀元年號以示之，其歷史、政治之象徵意義非凡，然改元不改曆卻是傳統。

辛亥革命推翻千年帝制，獨立各省或用黃帝紀年，有用干支紀年，情況混雜。¹⁰⁰孫中山先生回國，擬以中華民國紀元，援引陽曆。1912年1月1日，孫中山先

¹⁰⁰ 近年來多數的歷史學家或民族學者大體同意：「民族」被視為人群主觀的共通認同範疇。此範疇之建立，在於人們在特定的政經環境/時空裡，人們藉自我稱號以命名，對族源歷史加以回溯，用以強化族群內部之一體、相同性，做為區隔族群邊界，以凝聚彼我、排除他人。在建構民族認同之歷程，人們往往憑藉自己的立場、利益需要，擇取有利的歷史、史實予以重塑。於是：原來共同祖源漸被淡忘，而新的祖源獲得強調。又，重新調整那些「過去重要的人物與事件」，重新予以全新的詮解與價值，用以因應外在政治利益環境之變遷。十九世紀中葉，中國面對泰西文化強勢衝擊，先見之士開始思索中國與其他國家之關係，審度民族於世界秩序之定位，轉而朝以西方之「國族國家」(nation-state)為仿效目標，企圖打造屬於中國之「國族」。有趣的是，與其他各國雷同，晚清之知識份子在建構/立國族之過程，皆不約而同地將目光置於過去的歷史中，尋找一段/位可做為國族代表之光榮歷史與人士，以謀求文化自主或鞏固政治立場之磐石。學者沈松僑通過對清末民初黃帝神話、國民的「事」研究，闡明：「近代中國之民族主義是通過對歷史文化的重構，進而透過想像所建立起來的。」晚清不同政治群體的人們因不同需求，遂形成二種迥然的民族想像模式：一是以章太炎、孫中山為主之革命人士，其透過「血統」、「族群認同」為號召，強調排滿之正當性，主張「夷夏之辨」之必要，企圖以「血緣」作為凝聚人心之武器，祭出漢民族共同始祖——「黃帝」，作為革命大義之精神領袖，喊出「黃帝紀年」，象徵取代清室在中國統治之正統命脈。立場相對的另一方，是主張政體革新之康有為，其企圖從「文化」角度切入，構造普世性之天下理想，從而建立一個以文化為主之民族大義，故標舉「孔子」作為維繫國族之表率，提出「孔子紀年」以抗衡。於此，無論是種族民族主義，抑或文化民族主義，這二套關於中華民族的近代「言」，從晚清到民初都經歷一段重新想像與建構之過程。向來具昭示新政權誕生之「紀年」象徵，則成為兩方政治各自發揮之政治角力議題。詳見沈松僑：我我我血薦軒轅——黃帝神話與晚清的國族建構，《台灣社會研究季刊》第二十八期（台北：臺灣社會研究季刊社，

生就任臨時大總統。次日，發佈改曆改元，通電如下：

各省都督鑒：中華民國改用陽曆，以黃帝紀元四千六百九年十一月十三日為中華民國元年元月元旦。經由各省代表團議決，由本總統頒行。訂定於陽曆正月十五日補祝新年。請佈告。孫文、冬。¹⁰¹

通電具兩層意義：改曆——以陽曆取代通行於中國千年之陰陽曆（俗稱陰曆），且隨用曆之變，將歷代奉為重要的節日——新年，提前於陽曆元月1日慶賀；改元——以「中華民國」年號紀元取代革命人士在清末用來否定清帝、康有為之黃帝紀年法。

以「陽曆」取代「陰曆」有著使用上的考量：中國歷用之陰曆，著重月相變化，且兼顧一年二十四個寒暑節氣，對農業生產帶來極高便利，具有廣泛的實用價值，這是其能沿用不墜的主要因素。然以協調日、月運行所製成之陰曆，由於平年每年較回歸年約少十日，需每三年置一閏以調和，於行使方面尚有缺陷與不便。反觀各國習用之格勒哥里曆法（Gregorian calendar，即陽曆），因以「太陽回復規定年之長短，月之分法則出於人為，而與太陰脫離關係」¹⁰²其特色在於曆法內容擺脫天象行運，不再以節氣、朔望或日月運行軌跡作為依據，乃據地球繞日之日數作為劃分大、小月之憑據：「年」是回歸年，依照地球公轉天數計數，年下分12個月，大月有31天、小月有30天，每年的2月為28或29天，並以「星期週」和陽曆日月作為劃分時日之度量。取其簡單易用，格勒哥里曆法從1582年以來，陸續受到世界各國採用，成為全球通行範圍最廣之曆法。據了解，截至1912年為止，行用格勒哥里曆之國家有義大利、西班牙、葡萄牙、法國、波蘭、日耳曼諸幫、荷蘭、匈牙利、瑞士、丹麥、不列顛諸地、瑞典與日本各國，這些國力強盛之殖民宗主國，在拓展領地與宣示國威期間，不忘將慣用之曆法傳至各地，加速此曆法之影響力。¹⁰³晚清時期，即有旅外行者發現陽曆使用之便捷，評釋西曆長處：「一歲之日有定數，一月之日有定數，歲整而月齊，於政治上得充分便利，關會計出入無論矣，凡學校、兵役、罪懲，均得齊一。」¹⁰⁴清末宣統年間，諮議院奏請清室改採陽曆，獲得朝廷允諾，特派欽天監討論改曆事宜¹⁰⁵，後

1997年），頁1-77。

¹⁰¹ 見臨時大總統改曆改元通電 民國元年（1912）1月2日，收於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黨史委員會彙編訂：《國父全集》（台北：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黨史委員會，1973）冊1，頁783。

¹⁰² 見高平子：《平子著述餘稿》（台北：江蘇省金山縣同鄉會，1967），頁28。

¹⁰³ 此些國家採用格勒哥里曆之年代，詳見高平子：《高平子天文曆學論著選》（台北：中央研究院數學研究所，1987），頁137。

¹⁰⁴ 見錢單士厘著，楊堅校點：《癸卯旅行記》（長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1），頁49。

¹⁰⁵ 詳見《申報》大清宣統二年更戌十二月初七日（1911.1.7），第一萬三千六百二十二號，冊110，頁99下；大清宣統二年更戌十二月十五日（1911.1.15），第一萬三千六百三十號，冊110，頁227下。

因革命繼起、清室覆亡，來不及頒令改曆事項。

在政治上，清室預備改曆不果，繼由南京臨時政府成之，處處彰顯「改曆」一事意義深長。就曆法本身而言，以陽曆取代陰曆，自然取其簡易方便，繼而改更；就意義層面，擇用通行於國際間之曆法，主要為使中國在計時方面，可與世界同步，達到「走向世界」意向。因時間的標準化意味著人類克服空間上有形之藩籬，繼而使用一致的時間單位以統合人與社會的作息步調，故藉著國家政權以協調出一套通用於世界的標準時間制度¹⁰⁶，真正落實紀登斯所謂「虛空」、「一致」之時空要素。從同治時期開始，中國陸續使用「鐘點時間」代替「時辰制」，並透過西制講求時效，規範人之生活，扭轉人之觀念，無一不在此意義上，重複進行與世界同步之儀式，渴望成為寰宇間之要員。此番轉折，就像任公於西元 1899 年底，在橫渡太平洋之旅程裡，因感懷身世，寫下：

余鄉人也 余生九年，乃始遊他縣。生十七年，乃始遊他省。猶了了然無大志，夢夢然不知有天下事，余蓋完全無缺不帶雜質之鄉人也。曾幾何時，為十九世紀世界大風潮之勢力所簸盪，所衝激，所驅遣，乃使我不得不為國人焉，浸假將使我不得不為世界人焉。¹⁰⁷

在任公自詡由「鄉人」成為「國人」，進而期許為「世界人」之當刻，其捨棄慣用的中國律曆記註，反以西曆標明日期，標示意義在於認同自身為漢民族與中華民族一員的同時，也深自期許為世界萬國的一份子，故將自身納入世界版面，採用通行的時間作為儀式，宣告成為世界人，希冀從此與「世」並進，責無旁貸地共負世界重任。梁氏追求全新且深刻之身份認同，一來表現對自身之期許，二來將世界烏托邦與傳統天道觀中的世界大同理想，巧妙地重新連結。任公在正視晚清殘敗局勢之餘，不忘世界的存在，遂於競相奔走呼籲與振興國勢同時，預先為未來中國劃位，使其來日可重新站上世界舞台，遙想美好之幸福通衢。同樣存此想法者，尚有民國初年之輿論人士，認為：「新曆為世界所通行，舊曆為我國之習慣，世界趨於大同，則曆斷不能不改，況國體既改，新曆已定，似無舊曆之餘地矣。」¹⁰⁸有鑒「新曆」為「世界」通行之曆，在中國重新回歸世界當刻，世界將逐步趨向理想的大同景狀，從此觀之，何有不跟進改曆之理？

晚清時期，一系列有意無意向泰西學習之過程，皆富含希冀中國「重新」強

¹⁰⁶ 見呂紹理：《水螺響起：日治時期台灣社會的生活作息》，（台北：遠流出版事業，1998），頁 3-4。

¹⁰⁷ 詳見〔清〕梁啟超：《夏威夷遊記（舊題 汗漫錄，又名 半九十錄）》，《梁啟超全集》（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冊 2，頁 1217。

¹⁰⁸ 見 說新舊曆，《申報》中華民國三年（1914）1 月 3 日，即舊曆癸丑十二月初八日），第一萬四千六百九十五號，冊 126，頁 16 上。其文章原欲反映臨時政府推行新曆之窒礙曲折，卻於無意間，流露一般民眾將改曆視為與世並進之心緒，尤見此事在中國人心中之輾轉反折。（強調處筆者所加）

盛之企願，從初始無意識的薰染，至有意識地模仿學習，最終強勢地宣傳、改革，每一步履的跨越，向以西方為標竿。質言之，中國一切革新、學習之動力來源，皆為取得與泰西平等、同立之起始點，復圖日後之超越，故藏於豐沛競力背後者，是企圖恢復以往中國居於中心之榮耀，是古老「天朝上國的過時意識的復活。」¹⁰⁹晚清積極改革者在歷經東西方撞擊、對話後，因乍見泰西生活井然有序樣貌，及國富兵強景狀，遂藉由凝視、學習他者，將其視為目標與寄託，復盼中國他日與世並進，其複雜心態正同張灝先生所歸結般：「晚清思想的一個有趣特徵是，在力圖適應因西方擴張而形成的新的世界現實中，在一些中國仕紳身上出現了一種求助於天下大同哲學觀的明顯趨向。」¹¹⁰於是可知，正是此趨動力量不時鞭策、提醒時人，使其在調整腳步同時，有著可茲盼望的未來作為動能，才能加速中國社會重重改革，使其有著前進的力量。

（三）曲折的改曆談

改元、改曆之命令一經發佈，旋於社會各層引發反響。在適應能力強勁的上海區域，經明令頒行後，旋刻舉行慶賀活動「南北兩市華洋各商店及浦江所泊各國兵艦、商船均懸掛燈旗，同伸慶賀，公共租界會審公廨停理停讞政一天」¹¹¹，部分城區當晚還舉辦提燈會以示慶祝。然而，因陰曆在中國已習用千年，易陰曆為陽曆對農民影響甚巨，在推廣方面遭逢極大阻力。

1911年12月底，當國會提出改曆方案，遭到與會人士之否決，其理由：「孔子說：用夏之時。自漢武帝時起，中國即用夏曆到現在，已二千年，不可輕改。」又言「中西風俗，歷史迥異，改從陽曆，關係國粹農時」改曆問題遂引來喧囂，惹人商論。但改曆為不可不為之大趨，務必實行，故少數官員倡議折衷辦法，興言：「不如定立春日為元旦，勻分二十四節為十二月，仍閏日不閏月。現元月一號至立春前日為特別開幕月」，如此可「折衷陰陽，庶免序愆民惑。」¹¹²或以為新舊混淆，窒礙殊多，請諫衡取兩曆優長，創制另一種「新曆」。1912年9月11日，北京方面特向國務院提出擬定新曆的兩種方案，其一為：「一年仍為十二月（三百六十五日），除三、六、九、十一四個月為三十一日外，其餘均三十日，綜計年三百六十四日，所餘一日即以度年。」另一方案為：「一年分為十三個月（三百六十五日），每月均二十八日，綜計年三百六十四日，亦所餘一日即以度

¹⁰⁹ 見朱維鈞：《晚清思想中的民族主義》，收入劉清峰編：《民族主義與中國現代化》（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1994），頁285。

¹¹⁰ 見張灝著，崔志海、葛夫平譯：《梁啟超與中國思想的過渡（1890-1907）》（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1997），頁112。

¹¹¹ 見「今日舉行大祝典」，《申報》中華民國元年（1912）年元月15日，即舊曆辛亥十一月二十七日，第一萬三千九百七十九號，冊116，頁193上。

¹¹² 見《臨時政府公報》第10號，中華民國元年二月初八日，收於羅家倫主編：《中華民國史料叢編》（台北：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黨史史料編纂委員會，1968），頁0204。

年」¹¹³最終，此二種脫離傳統與現實考量之提議，當不取用，但它確實反映時人對改曆之憂慮。

向來，中國人民對民俗方面之儀式格外看重，特別與節令攸關之習俗，更為珍視。然繁瑣之禮節往來，往往使節慶盡失本真，徒淪虛文弊習，又礙於風俗久遠，不得不為之，經常一撒千金、耗費巨靡，對人們來說是項不小的負擔。以農曆新年來說，為中國人最為重視、隆重之節日，賀歲、拜禮、走春禮儀持續數日，極為繁複。此種耗時費金之禮儀互動，最先由上海一地公開批評，1876年一篇以論賀年為題之文，刊於《申報》上，內容對四處賀歲之習慣逐一細數：

蓋中國之行此禮也已久矣，中國官場每逢令節，無不行拜賀之儀，如端陽、中秋、冬至封印開印等事，均行整肅衣冠而往拜賀。至元旦則更甚。其他如壽辰、接報到任、接印奉委，以及婚嫁生育等事，亦皆具禮拜賀。若民間則無端陽等日拜賀之儀，至於壽辰、接報等事，若在戚友，固未有不行此禮者。

民間人士禮尚往來雖不若富貴人家頻繁，及之元旦仍須應付繁文縟節。以顯赫家庭來說，因「貂掛狐裘」，故天冷外出拜年絕非難事，往往一行數家，盡使僕役「從投帖留片」，虛應其事作罷；而貧賤之家，因「志在謀食，毫無暇晷，雖屬元旦，亦無暇行此虛禮」，反觀中等之家「下既不比貧賤之家，可以拖言謀生，無暇行禮；上又不比富貴之家，可以諸事如意，不必勞苦」，若遇天晴朗清「業已兩足奔波，沿門入賀，汗下如雨，體倦欲眠矣」，倘若雨雪盈途，泥濘載道，經終日勞頓一番「因此而受病者諒亦不鮮矣。」¹¹⁴此後，每逢年節，上海媒體常呼籲民眾盡可能簡化賀歲禮儀，特別是官場禮節。十九世紀九十年代後，為省去虛浮應對以善用時間，上海開通之士「相約不賀新年而行團拜禮，以破社會之積習，亦改良風俗之一事也。」¹¹⁵之後，每近新年時分，常有民眾踴躍寫文，鼓勵推動新年習俗之改革，1905年上海《時報》另闢「風俗談」專欄，連續發表十三篇關於新年習俗之文，以為過年習俗雖無需廢除，但必須改良。

晚清最後數年，無論維新黨人抑或革命黨人，甚是民間輿論，皆不約而同地都將風俗改良與革新政治視作一體。1905年《時報》析論風俗與政治間的微妙干係，洋洋灑灑地析論：

我中國之衰弱，不僅政治上之失調而已；我中國近日之當改革，亦不僅政治上之改革而已，風俗又宜急焉。何則？政治者，在上；風俗者，在下者

¹¹³ 見 民國有將有特別新曆發現，《申報》1912年9月12日。

¹¹⁴ 見 論賀年，《申報》大清光緒丙子年正月初六日（1876.1.31），第一千一百五十二號，冊8，頁81上。

¹¹⁵ 見李維清：新年團拜，《上海鄉土志》（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頁91。

也。政治者，由風俗醞釀而成；風俗者，由政治陶鑄而出者也。故但改良國政而不改良風俗，無益焉。¹¹⁶

此言儼然是謀求風俗改良者之心聲。鑒此認知，革命者莫不將改易風俗視作實踐政治變革之手段之一。

二、新曆頒佈歷程

民國初年，自南京政府成立後，除全力建設政治體制外，繼而延續前時經驗，竭力移風易俗。鑒於扭更千年民習非可一蹴而就，初始，政府顧慮陽曆不易在民間推行，又思及農民需求，決議兩曆並行置用，編定首本兼載新曆、舊曆之曆書，造福群眾。

（一）新舊曆書之融合

1912年1月，南京臨時參議院根據民國改曆精神與國民之風俗習用，議決頒曆辦法四條：

- 一、由政府於陰歷十二月前制定歷書，頒發各省。
- 二、新舊二歷並存。
- 三、新歷下附星期，舊歷下附節氣。
- 四、舊時習慣可存者，擇要附錄，吉凶神宿一律刪除。¹¹⁷

新式曆書的編定，體現政府欲破除民間附會神鬼之說之迷信舊俗，摒棄舊曆書中充滿陰陽福禍、吉凶生剋之記錄，只存有二十四節氣與農時習慣，一方面既是對民間力量之認同與妥協；二方面不違改良風俗之本意。此後，中國之曆書習見新、舊曆並存、中西互通。嚴格說來，後世情況之延續，乃以民國編印之首本曆書為嚆矢。日後，所有曆書、日曆與風靡一時之廣告月份牌，習慣納入新舊曆月、日期方便對照，所有日月均注星期，並於列沿以陰曆註明二十四節氣，形制與今日習用之日曆相同。

（二）過農曆年？還是新曆年？

一般人民視陽曆為「官曆」、陰曆為「民曆」，新舊參用、官民各分。然時值歲末新至，究竟該以新舊曆年為慶祝對象，竟衍生嚴重分歧。1913年陰曆新年之際，政府為削弱各地對農曆春節的影響，故未編列名目放假，令各機關照常辦公，不料民間倒大肆慶賀舊曆年，事實反應新曆之推行並不普及，或不受民眾重視，

¹¹⁶ 見《時報》1905年3月10日。

¹¹⁷ 見 飭內務部編印歷書令 民國元年（1912）1月，收於《國父全集》（補編），頁422-423。

以至「正朔已更，舊曆宜廢」，然民間習於歲時伏臘，只知中曆不知有西曆。原應張燈結彩之公元元旦，反落清寥靜寂；一旦農曆春節，各地鑼鼓喧天，熱鬧非凡。1914年元旦，政府企圖發揮市政力量，有計畫地在北京、上海、天津等重要城市營造新年氣息，不僅連休三日，更積極點綴各大通衢，吸引民眾參與，結果「名為改行新曆，而各界中無一能行新曆者。」¹¹⁸

此情況以上海取作樣本，最具代表。光復後第一個元旦，滬軍督府為勵行新曆，通令全市視陽曆元旦為年節，鼓勵舉行慶賀儀式，然此通令只在少數行政區獲得響應，都市裡參與者寥寥，遑論偏鄉地帶，根本無人搭理，無法凝聚過節氛圍。同年1月15日，滬處商埠按照陽曆標示共慶元宵，各店懸燈掛綵，一般人人家卻不為所動，天空也不見滿月，因依中西曆比對，當日是農曆的11月27日，連年都未過。類似笑話層出不窮，有心人士特作竹枝詞諷曰：「維新元旦話今朝，初次新年尚寂寥；十五夜間重補祝，真稱特別鬧元宵。提燈盛會到天明，滬上堪稱不夜城；但見商團軍事眾，鄉人只說夜觀兵。」¹¹⁹又，「改行陽曆始今年，春夏秋冬盡失傳；老病最防交節氣，從茲終歲得安然。」¹²⁰就此可知，臨時政府企圖高揚新曆、盡革陰曆之嘗試，最初踐行步履相當艱難，以致各界糾謬情狀不斷，不能視為成功之舉。

究其原因，中國傳統習俗在其中仍大展生命力。必須反覆強調，中國陰曆向為農家經驗之結晶，屬農耕文化之寶貴資產，農民一切農作活動仰其指導。二是，人們對神祇之尊崇、祭拜，舉凡每月朔望焚香祈禱，抑或歲時伏臘進行滋補，皆按舊曆年月行之，一經擅動，全無所藉。故制曆期間，曾有人向中山先生提議：「現在頒行新曆，所有舊時節令，擬請援例實行。」就是擔心舊曆廢除，將對農民帶來傷害。此外，中國之年日，一般以為與天時相對，一人未來之興榮福禍，往往與生辰、干支屬相對應，這些皆按照舊曆加之推數，是中國風俗內容中，相當特殊之景致。尤最重要者：人民平日已習用陰曆成性，舉凡民間借貸等事，遂按舊曆年關作結算期限，具送舊迎新之吉祥意。¹²¹突遇急改正朔，舊帳難以清理，

¹¹⁸ 見 時評，《時報》1914年1月29日。

¹¹⁹ 見湯偉康：《辛亥上海光復後滬城風俗的演變》，收於林克主編：《上海研究論叢》（上海：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1993）第8輯，頁350-351。

¹²⁰ 同前注，頁351。

¹²¹ 中國之年節習慣，往往透過整頓帳目、清償帳務，以慶祝新年到來。一般人深信欠款諸事，不宜留至新的一年，如無法完全償還，亦必於年節前夕，做出滿意安排，盡量避免債留過節，影響來年運勢。倘有總債務超過資產情形，亦需在年前做出打算，將一切可利用之資產轉入債權人手中。這樣總清償之後果，往往令借錢利息攀高，進使當舖擁擠，致令有心投機份子從中獲取牟利。舊時上海的商家對於所賒帳目，一般皆有定期收帳的時限，又因收帳時間的不同而分為大、小月底帳、大月底帳、節帳三種形式。大、小月底帳各於農曆每月的十五、三十兩日各收帳一回；大月底帳是在農曆每月的三十這天收帳一次；節帳則在農曆每年的端午（五月初五）、中秋（八月十五）及年底（十二月三十）此三時間各收一次帳。詳見（美）衛三畏（Williams, S. Wells）著，陳俱譯：《中國總論》（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頁564-565；蔡豐明著：《上海都市民俗》（上海：學林出版社，2001），頁218。

致令所有人士慌忙亂腳 倉皇失措，許多債權人害怕欠債者以新年（陽曆）已過，藉故賴帳，紛紛請照以舊曆新年結算，類似文作反映當時新舊交雜景貌：「帳單一紙去紛紛，月底仍然大小分，尚有一般常欠債，不逢三節沒分文。」¹²²「新曆收錢到號頭，商人欲改乏良謀；倘然力矯從前俗，反說無錢任自由。」¹²³此事於年關逼近時分，引來愈多爭論。滬軍通督刻聞，急發告電，曰：「惟查滬上社會習慣，商店帳目、民間借項，往往年底為歸宿之期，互相清理；此時改用陽曆，倉促更新，各界帳款辦理，難免刁詐者流借詞推諉，致多棘手。自應妥籌良法，庶商民不致稍受影響。」因而，陳其美宣布年關帳目仍依舊曆十二月三十日「暫照舊章分別結算收還」¹²⁴，全國比照上海模式辦理。是故，光復當年臨時政府工商部通告仍以「2月17日即舊曆除夕作為結帳之期」¹²⁵儘管相關單位乘機應變，做出裁策，然類似紛雜混亂情形，不僅見於工商業界，其他人士亦遭逢類似困擾，各機關、學校、團體雖奉行陽曆，改用民國紀年，但一般各行各業仍沿其舊。新舊過渡期間，不只新舊年曆之使用情況混雜，連同對「紀年」運用亦然如是：在新印日曆時，許多書商為滿足不同客源之心理，另發行以黃帝紀年以代替民國紀年，或選用甲子紀年，甚或宣統紀年之不同版本，以饜所求。有竹枝詞敘其事：「新歲期刊月份牌，各家爭賽畫圖佳；編年民國與黃帝，竟有仍將宣統排」¹²⁶、「四千餘載有誰言，黃帝無端溯紀元；民國告成仍改卻，誓且重立舊中原。」¹²⁷多元之「時間」表率，各自在每人心生根萌芽、增生意義，這是外在法規難以強勢扭轉的事實。

（三）二元時間之疊影

民國元年十二月，由上海工商會主持之商務總會常委會，再次做出決定：「元旦為一年之始，且為臨時政府成立之日，各業自應休息一天，並升旗懸燈。」¹²⁸次年，各業始歇業一日。於是，在各業大老出面協約後，各行各業漸次仿行元旦公休制。自此，歡度新舊曆年成為中國民眾特有的生活樣貌，時人認為：「新曆之新年，係政治之新年，舊曆新年，乃社會的新年。此北京社會之新年氣象，乃較新曆不只繁盛十倍，可見政治之勢力不及社會也。」¹²⁹與此同時，舊曆年之年

¹²² 湯偉康：《辛亥上海光復後滬城風俗的演變》，頁352。

¹²³ 同前注。

¹²⁴ 見《商民暫准仍用舊曆》，《申報》1912年1月3日。又，民國元年七月，上海錢業會館打破繁囂，提出廢革按舊曆年結帳之要求，經七月十九日經「總會常委特別會議」議定：「准照錢業議，俟本年舊曆年底結帳後，即以明年舊曆元旦起改用新曆結帳」

¹²⁵ 見《宣布除夕結帳之電文》，《申報》1912年1月9日。

¹²⁶ 見湯偉康：《辛亥上海光復後滬城風俗的演變》，頁352。

¹²⁷ 同前注。

¹²⁸ 見湯偉康：《辛亥上海光復後滬城風俗的演變》，頁352。

¹²⁹ 見黃遠庸著：《舊曆新年發筆》，氏著：《遠生遺著》（上海：上海書店，1980）卷2，頁297。

節，如端午、中秋、重陽、冬令等著名時日，仍藏在民眾之日常運作裡，特別是稼莊地區，凡歷重大時節，人們仍堅持以傳統原貌、嚴謹步驟，踐行對習俗之崇敬，以昭懷想。反觀都市化較濃烈之商貿地域，民眾雖同樣實踐各式歲時年慶、祭祀節日與賀慶時節，然於形式上已較往昔簡省許多，甚至揉入新時代氣息：如以迷信成分居多的習俗，或純迷信之時節逐步淡出人們生活，或在傳統節日中融入各項西式元素，增添新意。總之，在時代推演之歷程裡，舊的文化精神儘管希圖予以存留，然於內容、行事上，不免與時俱進、汰舊換新，創生新風貌。

面對一個世界各國通行之曆，以及一個千百年慣用的曆法，兩者並用既適應世界潮流，又存留中國精粹。時人曾戲謔似的言說：「你愛摩登，可遵新曆；我是老朽，且從夏制。」¹³⁰新舊之間取得平衡，成為華民慣用之時間模式。

三、新式節日、紀念日的形塑

在新舊論爭尚未得到弭合同時，另有一股時間力量悄然興起。許多新式節日、紀念日相繼活絡在人們政治生活與日常生活中。以民國初年來說，較著名者有受政府積極呼籲之元旦、革命先烈紀念日（3月29日）、中華民國雙十國慶日（10月10日）等日，幾經宣暢，次第成為人民看重之紀念節日。

實際上，居住在滬界內的僑民，每逢母國國慶、天主聖誕之類的重大節日，常於外灘、公園舉行盛大之集會、遊行以茲慶祝，此在華民心中留下鮮明之境。1893年11月17、18二日，公共租界為慶祝上海開埠五十週年，舉辦各種慶祝活動並燃放耀眼煙花，在外灘，一幅標語高懸「世界何處不知上海？」大方展示工部局在上海墾殖之榮耀成果，諸國各以不同方式進行紀念活動：高豎碑牌、林立人形銅像，記憶於筆路藍縷時期為「國」犧牲之烈士。外國移民者陸續在上海，按祖國光榮的歷史光譜和生活節奏過日：1897年英僑大舉動員慶賀維多利亞（Victoria）的鑽石婚、1901年復慶賀英王愛德華七世（Edouard）加冕典禮、1898年德國人載歌載舞地歡迎來訪之普魯士王子（prince Henri de Prusse），¹³¹各國藉此種種以排遣揮之不去之繾綣鄉愁，另方面欲通過典禮/儀式活動之行進，溝通群？之共通價值，強化原生地之驕傲印記。

先見者如梁啟超對類似祝典相當看重，企圖起而效尤，曾於《清議報》印行百冊之際提出看法，以為：

東西各國，每年必有一二日之大祝典，為國民榮譽之紀念，如美國之七月

¹³⁰ 見姚穎、張士超：《陰陽曆新年之比較》，氏著：《京話》（台北：文海出版社，1972，《近代中國史料叢刊》），頁98-99。

¹³¹ 見（法）白吉爾（Bergere, Marie-Claire）著，王菊、趙念國譯《上海史：走向現代之路》（上海：上海社會科學出版社，2005），頁83-84。

四日，法國之七月十四日，為其開國成功之日，年年祝之勿替。這種慶祝活動，可使人記已往、振現在、勵將來，受到愛國主義的教育，更增添強國、勇猛、進步、自立之氣。而我國向來無此風氣，號稱一年中普天同慶節，惟一元旦。而這元旦不過地球繞日一週而復，毫無意義之天象，沒有什麼特殊的或重要的意義。中國人對於前人的事業，則只有考據而無紀念，因此歷史的思想薄弱，而愛國、愛國體、愛事業之感情也因以不生。

132

上述引言，充滿梁啟超期許中國民眾找尋、建立「紀念日」之情切。任公站在歷史大潮關口，以為中國民眾一向缺乏鍾愛國家、國體之情，比起泰西進步諸國，外僑相繼慶祝「元旦」、「建國日」，並非徒事慶祝「年之新始」。年復一年的慶典大會，不光只是單純的形式操演，真切的意義在於主事（政）者欲藉著種種儀式、遊行、或慶祝活動，紀念與之相關的歷史事件，或為了回憶一個據信在某個歷史日期曾發生過之戰役，感謝它為美好的今日做出貢獻，繼而逐步將國之價值、意義訴諸民眾，使之燃生一套相當「民族主義」之向心情緒。是以，所有的儀式皆具重複性質，透過再次重複以深化人們對國家歷史、傳統之回溯。想當然爾，後人藉由儀式之再現，喚起深具文化意義的符碼，作為延續過去精神之宣示。於是，透過有形之儀式過程，將無形地建立起人民對國家或民族之認同。

梁氏滿懷激情，在世變之亟的存亡年代，期望透過諸種宣示/招魂形式，盤算如何從湮沒的歷史中，擷取一段彰顯民族之光榮時刻，亦或抬出傳奇英雄或指標人物，進行神話般之重建大業，以典禮式樣反覆運作，在一年中的同一時間，按照事件重複發生之週期準時慶祝這個節日，使人抱持虔誠的態度參與一切，以喚起民眾對國家（民族）之認同，塑造社群之集體記憶，恢復人們之榮耀，培育兼具「強國、勇猛、進步、自立」優點之「新民」，其最終目的正如涂爾幹所闡析的：

通過舉行儀式，群體定期地重新煥發集體情感，同時個人增強了他的社會本性。值得紀念的光榮事蹟活生生地展現在他們眼前。從中他們感到一種同根所生的感情，他們感到自己更強大、更有信心。當一個人看到如此遙遠的過去又回來了，如此偉大的事物又重新激盪著他的心懷，他的信仰變得更堅定了。¹³³

透過特定時間舉行的懷舊式之典禮，不光喚醒人民心中高度尊嚴與堅毅信念，且

¹³² 見〔清〕梁啟超：祝辭，《梁啟超全集》，頁2010。

¹³³ 見愛彌爾·涂爾幹(Durkheim, Emile)著，芮傳明、趙學元譯：《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台北：桂冠出版社，1992)，頁422。

迅及劃出你我之別，不單是血脈的，還包括一切民族與文化，瞬間重新建立自我之價值定位。故特定儀式不但具備記憶過去歷史之優點，其存在與必要性對一國/民族而言，一如蔣方震振聳發矇地剖判：

一民族而能立國於世界，則必有一物焉，本之於特性，養之以歷史，鼓之舞之以英雄，播之於種種社會上，扶其無上之魔力，內之足以統一群力，外之足以吸入文明與異族抗。其力之膨脹也，乃能旋轉世界而鼓鑄之；而不然者，則其族必亡。¹³⁴

是故，在此接合點上，「儀式」與民族國家竟具有高度關連性，原生的紀念日透過高舉宣揚，為國族想像與意識型態提供發揮空間，增強形塑人民的社會意象，試圖營造一泱泱大國之氣度。今日看來，人們對「儀式」的追索與看重，實屬後設手法，是現代進程中相當弔詭的存在，其作用就像時人往往站在現在（當下），回頭尋找已發生的「過去」，作為對未來的準備。如同蘇珊·弗里德曼所言：

如果說「傳統」是在對「過去」的延承之路上預言「未來」的進展，那麼「現代性」則永遠是把對「過去」的顛覆看作「未來」的前奏。¹³⁵

各國儀式之存在，是今人向過去求索的產物，其目的在為美妙的未來奠基。儘管它充滿人為創造的痕跡，卻是梁啟超以及民初等輩，試圖召喚回來的共同記憶，用以催化人們對國家、民族之情感。其運作手法與宗旨，恰如底下引論所言，蘊藏妙不可言之深意：

「創造傳統」是一系列的實踐，通常是被公開或心照不宣的規定控制，具有儀式性或象徵性的本質。它透過不斷地重複，試圖灌輸大眾特定的價值觀與行為規範，以便自然而然的暗示：這項傳統與過去的事物有關。傳統的「創發」其特殊性就在於：這樣的傳統與過往歷史傳統的關聯性是「人工」接合的。簡言之，被創造的傳統是對新時局的反應，卻以與舊情境相關的形式出現，或是以類似義務性質、不斷重複的方式建立自己的過去。

¹³⁶

所有儀式，不管聲稱它們的來歷如何古老神聖，皆仍是在某個時刻被創發而生的。如同晚清諸輩，力圖倣效泰西文明，竭力在各類慶典活動背後，隱匿各式

¹³⁴ 見蔣方震：《國魂篇》，《浙江潮 社說》第一期甲辰十月十五日四版，收入羅家倫主編：《中華民國史料叢編》，頁6。

¹³⁵ 見蘇珊·弗里德曼著，張慧文譯：《定義之旅：「現代」/「現代性」/「現代主義」的涵義》，收於劉東主編：《中國學術》（北京：商務印書館，2002）第10輯，頁25。

¹³⁶ 見霍布斯邦(Hobsbawm, Eric J.)：《一導論：創造傳統》，氏著，陳思仁譯：《被發明的傳統》（台北：貓頭鷹出版社，2002），頁11-12。

中國國族文化、歷史，使其透過旗幟、想像、音樂與儀式圖騰，嵌入人們的腦海中，令人們態然地領受民族、國家認同情志之洗禮。

隨著以外僑為載體之歐式生活根植上海，僑民對聖誕年節、春節的重視不減往昔，上海民眾因頻與泰西迎復往來，感染西洋宗教節日之歡樂氣氛，漸起仿效新意。民國初年，許多非教徒民眾，因感染愉悅、虔誠氣氛，時興歡度西洋年節，進而引來輿論者側目：「昔之風俗，冬至日獻襪履於舅姑，今日但知有聖誕節，不知有冬至，但知有聖誕老人贈兒童玩具之襪，乃至新婦多不願有舅姑，違知有獻襪乎？」¹³⁷ 充滿過節氛圍的西洋年慶，在中西交往不斷深化，以及商業不斷鼓吹操作、包裝下，確實凌駕中國節慶，成為人們喜善慶賀的日子。

四、珍攝時間：延年會的創設意義

對「時間」的控制與把握來說：中國人素來缺乏概念，致使陋習或與人們向來缺乏明確時間的意識息息相關。一般民眾對約定時間向不講究，遲到一事更是稀鬆平常。及至雙方面會，主客間相互禮讓之客套應酬又用去多數時間，待談及核心問題與展露拜訪目的，多半已歷一番折騰，赴宴一回往往用掉整個午後時光。看在西人眼中，除非不得不然，否則與中國人往來斡旋，誠是件棘手問題，因為中國人從不珍惜自己與對方的時間。西方觀察家靈活地例舉經驗：「最可怕的是出席中國人的酒宴，其持續的時間之長幾乎是沒完沒了的。酒菜的數量之多、花樣之繁，幾乎難以置信。所有經歷過這種場面的外國人都會感到恐怖和不知所措。而對中國人來說，這種招待所花費的時間還嫌太短。」¹³⁸ 另外「中國人在訪問外國人時，一坐就是好幾個小時，一個勁兒地說，不知在說些什麼，也不說要走。如果對一位正說到興頭上的中國人明確表示自己很忙，那往往會給他當頭一棒。他會長時間地一言不發，默默地忍受著，其時間之長足以消磨掉 10 個歐洲人的耐心。」¹³⁹ 類似情況，對廣大中國人而言可能不覺有異，但看在行居有節的西方人士，或是留學外洋的中國人眼裡，實有感觸，胡適曾感嘆：

我回中國所見的怪現狀，最普通的是「時間不值錢」。中國人吃了飯沒有事做，不是打麻雀，便是打「撲克」。有的人走上茶館，泡了一碗茶，便是一天了。有的人拿一只鳥兒到處逛逛，也是一天了。更可笑的是朋友去看朋友，一坐下便生了根了，再也不肯走。有事商議，或是有話談論，到也罷了。其實並沒有可議的事，可說的話。¹⁴⁰

¹³⁷ 見黃濬著：《花隨人聖廬摭憶》（香港：龍門書局，1965），頁 265。

¹³⁸ 見解本亮著：《凝視中國：外國人眼裡的中國人》（北京：民族出版社，2004），頁 139。

¹³⁹ 同前注。

¹⁴⁰ 見胡適：《歸國雜感》，《胡適文存》（台北：遠東圖書公司，1961）第 1 集，卷 4，頁 625。

近代上海人交際關係日益增多、中西交通頻仍。在見賢思齊之浸染下，部分商士奉行西方交往禮儀，如於宴會舉行前，主人預發請帖，寫明時間地點，時間一般安排在中午十二點半或一點，有時排定在晚間。受邀賓客於接帖二十四小時內回復，言明來或不來。如去則一人赴宴，不加攜帶親友子女。飯後或有娛樂活動，客人不能立即告辭，但可與人稍事周旋，後與主人告別。¹⁴¹如此一來，既免去惱人的繁文縟禮，對時間之應用亦分外謹慎，以免自誤誤人。

在晚清眾多風俗改良團體中，湖南「延年會」的改革運動專門針對人們少有留意之「時間」為主，亟欲改變中國人漠視時間之瑕玷。延年會由熊希齡首倡，其以為：「天無年，無可延也；人有年，可自人延之也。」¹⁴²名以「延年」並非教人延年益壽、長生之道，而是提倡學習西人簡潔之禮俗與合情之生活模式，戒除中國人習慣將時間耗於不必要的請宴客，或各式虛文酬答、無謂遊戲的不良習慣，以培養節約習慣，學著將時間運於事業或有益之事件，以達「延年」要意。此議深獲譚嗣同等人支持，延年會遂於1898年4月25日成立於長沙湘報館內。譚嗣同從人之禮節、宴飲、旅行、娛樂方面，列舉諸項玩日愒歲之習，以為「文明愈進者，其所事必愈簡捷，簡捷云者，非以便人之苟焉為窳惰也。文明愈進，其事必愈緊，不簡不捷，則生人之年，將不暇給。」¹⁴³此論與近世對「速效」理念之追求相當契合，故積極呼籲在日趨繁複的時代，人們對時間的使用更應有所節制、安排，毋能毫無節制地浪費光陰。鑒於此道，譚氏參酌西人之生活節度與社交慣習，定下「延年會章程」，制訂作息時間，繼之要求見客、拜客、請客諸事一律從簡，認為惟踐此道，使人之生活：「無紛擾、有閒暇」，加上確鑿、有效地利用時間「則一日可程數日之功，一年可辦數年之事。統合算之，將使一世之成就，可抵數世」¹⁴⁴，以為泰西諸國今可成就大業，皆因懂得摒棄各類冗縟事宜，精當用時，使人不耗於瑣事，而近世諸人駛火輪、駛鐵路、引電線、傳記號、運機器、廣製造，皆為節約時間、收效迅及之功，致令西人得以打造今日盛世，歸咎總因，不外懂得延年之理。鑒思及此，譚氏洋洋灑灑地為所有中國人設計一套「行有定程」之行事表，若「每日六點半鐘起，學習體操一次，七點鐘早膳，八點鐘至十一點鐘辦各事，十二點鐘午膳，一點鐘至二點鐘見客拜客，三點鐘至六點鐘讀書，七點鐘晚膳，八點鐘至九點鐘辦雜事，十點鐘睡」¹⁴⁵、「逢五日騰出三點鐘時刻復遠方各處函件」¹⁴⁶一切操之有節的定則背後，實隱含譚氏欲藉此打造國強、國富之宏願。

¹⁴¹ 見陳伯海主編：《上海文化通史》（上海：上海文藝出版社，2001），頁379。

¹⁴² 見〔清〕譚嗣同：《延年會敘》，氏著：《譚嗣同全集》（台北：華世出版社印行，1977），頁140。

¹⁴³ 同前注，頁141。

¹⁴⁴ 同前注，頁140。

¹⁴⁵ 同前注，頁142-143。

¹⁴⁶ 同前注，頁143。

第四節 時間權力競逐

從「鐘點時間」與「陽曆」在中國之推行、深化過程，不是單純「以新代舊」之挪用，背後且蘊含錯綜之權力角逐。從上述討論可知「鐘點時間」在中國之傳布歷程較陽曆似乎更為平順，主要情由如黃金麟所揭示：

鐘點只是將時辰一分為二，作一更精準的分時，而這種努力又可以取代表、漏刻、燭刻、和刻香等計時工具，提供時辰一個更好的計算基礎下，鐘點的使用自然能與時辰並立，不受到排擠。因此，當鐘錶大量輸入時，十二時式的日夜時間計算也跟著變成一種約定俗成的習慣。¹⁴⁷

因鐘點時間「只是」單純地將原有時辰更為精確地細分，故易受人們領接，進而成為約定俗成之範式。除此以外，筆者以為「鐘點時間」在中國少受排擠之根本原因在於：儘管「時辰制」歷時久遠，但人們真正運及它的頻率不多。一生之中，惟有婚喪嫁娶、人之生死大事中，人們才會「特別」重視時辰，以之比對天運吉凶。一般時候，因生活中從無必需恪守的切確時候，於是多數人時以「概要」或雙方皆能了然的語言來表述時間，此種時間往往是模糊且缺乏根據的。1840年前後，美傳教士古伯察（Huc.Evariste-Regis）曾有相當深刻的問時經驗：適逢一行人前至農村拜訪新教徒，途中問時於一年輕華民，此青年因無法透過烏雲罩日的天象判斷時分，竟透過貓瞳孔對光之反應，言之鑿鑿地判定當刻未過中午。¹⁴⁸看 在洋人眼中幾乎無異之貓眼，竟可作為民眾依時之工具，並非個例，說明一般華民經常透過身邊可茲引用的物件，加之對天候的經驗，作為判定時分的依據。問及準確與否？或許生無大事，一般民眾對時間要求度低，無需過求精確，相對的也就不如此在意。於是，種種今日看來誠屬可笑的事件，對時人來說業已足夠，而「時辰」在人們生活裡的實用與必要程度，結果呼之欲出。

不單民間對時間漠不在意。除去以觀時為生的欽天監官員外，一般政府機構對時間的要求亦不考究。德國新兵營訓，以每十分鐘、二十分鐘、三十分鐘，或一小時作為單位，要求兵士需做出多少相符訓練，使其身體機能扭於規定，培養最高戰鬥技能。反觀中國，曾國藩以治湘軍馳名，然仍以更點、黎明、午刻、日斜和燈時作為操練準則，真正以時辰計數的機會寡鮮。¹⁴⁹此時，從西方傳入的鐘錶與鐘點時間，雖面對延傳千年之時辰制，然時辰對人民產生的效應與管束微乎

¹⁴⁷ 見黃金麟：《鐘點時間與身體》，《歷史、身體、國家：近代中國的身體形成（1895-1937）》，頁198。

¹⁴⁸ 見古伯察（Huc.Evariste-Regis）著，張子清、王雪飛、馮冬譯：《中華帝國紀行：在大清國最富傳奇色彩的歷險》（南京：南京出版社，2006）冊2，頁315-316。

¹⁴⁹ 有關湘軍日夜常課規定，以及曾國藩的帶兵形式，詳見赫治清：《中國軍事制度史：軍事教育訓練制度卷》（鄭州：大象出版社，1997），頁232-237。

其微，故「新式時間」與「時辰制」兩者非是敵我分明之對立關係，亦少涉及價值方面之傾軋。反是新式時間之存在與引用，等於重新教育、培養華民對「時間」應具備之認知與價值，而非強迫人民從根深不移的舊習中，硬逼人們從中取一，非此即彼。從其他角度切入，鐘點時間於中國，真正涉及層面卻是中西方兩的權力競爭，如黃應貴論及：

時間觀念所具有的過去與現在或未來傾向而涉及權力集中及其穩定性的差別所凸顯社會性質上的差異外，時間觀念的多樣性本身也往往涉及另一類社會性質的差別：凡是時間的多樣性愈大，其間的文化基礎愈不一致，則愈涉及社會內部不同群體間的不平等權力關係，或者涉及不同社會文化間的不平等權利關係。換言之，不同的時間觀念與系統，往往涉及不同群體或文化之間的支配與被支配關係。¹⁵⁰

泰西諸國挾帶強勢文化，將現代性的鐘點時間引入華地，不同時間節點的展現，隱含強勢文化作為後盾，而外僑透過佔有（appropriation）、制度化（institutionalization）合法化（legitimation）等進程，強制將新式時間與系統注入華民生活，本身就是文化強弱權力角競之成果。¹⁵¹略顯差異者僅是在操作過程中，主事者將以何種技巧使傳統人民甘願接受外來時間，減少磨合衝突，且真切地於日常生活順從之、習用之的運作形式。

當然，鐘點時間的普及化，如果僅從不對等之二文化權力視角討論，將流於窄化。事實上，鐘點時間得以廣布，絕大要素與資本主義全球化，需藉統一之時間溝通，方利商品之生產與交易順遂有緊密聯繫，隨資本主義發達攀升之科學發展，建構出依抽象、可計數的時間型態，將其用於展現時間，復透過時鐘儀具的商品化與普遍化，使其廣為人們所依循，加速鐘點時間對生活的制約。真正推動新式時間系統普及的巨大助力，是工業生產引發的巨大漩渦，漸進地將全球納入此番環境，使其透過精確之時間運作，創出更高產值，無論是機器的出現，或是工人的勞動力，皆以追求效率為至高原則。於是透過泰西工業展現之高超效率，中國方面等同暗自承認自身之不足，故繼起效法。鮑曼（Bauman Zygmunt）曾對現代性與時間做出詮解，其以為「現代性就是時間的歷史（the history of time）：現代性是時間開始具有歷史的時間。」¹⁵²繞口令似的界說，恰好證明現代生活中因講求理性、速效，遂令「時間」如鬼魅般藏匿於「時間表」中，無處不在地對人施予脅制，使人難以擺落。故，時間才是真正握有權力的掌控者，其透過精密

¹⁵⁰ 見黃應貴：《時間歷史與記憶》（台北：中央研究院民族研究所，1999），頁9。

¹⁵¹ 同前注，頁10。

¹⁵² 見齊格蒙特·鮑曼（Bauman, Zygmunt）著，歐陽景根譯：《流動的現代性》（上海：上海三聯書店，2002），頁173。

的時鐘、龐大的機械齒輪、生產線永不停息的轉動，逐一箝制人們渺如螻蟻的身體與意志，以成就全球化的普同性。

相對的，同樣是強勢文化帶來的「公曆」(陽曆)，在取替「陰曆」的過程，即憑添較多頑抗、糾謬之情緒反應。事實上，甫自上海開埠，陽曆即隨僑民存在於上海界區，歐美民眾由每週的禮拜活動示其存在，多所由教會開辦之學校，更無保留地採用格勒哥里曆法之時間計數，及至中西接觸繁興，人們普遍也知「星期」與「星期日」的存在意義(上章節有詳盡討論)。1872年開始，閱報人次最高之《申報》堂皇地將西曆高置刊頭，使中西曆同為記日符碼。這些真實的存在，皆早於諮議院諫請改曆運動。居於四方匯地的之上海華民，業已習慣兩曆並用的生活模式：只要西國行鋪停止貿易，就是西僑舉家上教堂之休息日；西人以萬國博覽會之姿繞街遊行，人們見面相互祝賀，即是西國的聖節或新年日。相對的，華民亦不忘慶祝自有習俗，每逢農曆三月天之后聖誕、城隍夫人誕辰，上海全邑居民張燈結彩，綿延不絕。舊曆新年商賈紛紛早起走市，聯絡彼此感情，拓展人際交流；正月初五，相傳「五路財神誕辰」，此起彼落的爆竹聲，不絕於耳，基於對爆響震天與人身安全考量，逼得工部局不得不做出限定。¹⁵³

既已有先前經驗，何以臨時政府電告，改令陽曆以取陰曆，於上海一地仍引起不少爭端？究其原因，是主事者過於玩忽傳統的力量。中國人對農曆之使用，以天干配合著地支的時間計算法，將時間概念抽象化，有著對計算時間之獨到性。舊曆中的時、日、旬、月、年、與節氣之知識是人們生活依賴的準則，它的存在與生活、生產密切攸關。中國農民為社會生產主體，佔多數人口，一切生活作息，當以農民為要。人們可以不確定現時幾時幾刻？但何時應播種、收成，或何時需進行祭祀儀式斷不可忘。針對此點，王爾敏先生精闢闡述：

從中國農業社會生活重點，約略判定中國人民生活。自漢代以降，大致共通之處，每月各有重要活動，歷年周遊循環，直迄近代。自《夏小正》《周書 時訓》、《呂氏春秋 十二紀》、《禮記 月令》，以至《淮南子 時則訓》等書所分十二月二十四節氣，以至七十二物候。在公元前五世紀至公元前二世紀間，以充分習用深熟，上自官家，下迄民庶，無不遵循。¹⁵⁴

¹⁵³ 節慶期間，華民將燃放爆竹視為帶動活動高潮的重要活動，在慶賀神佛誕辰活動中，爆竹聲響具有嚇阻邪靈之宗教作用，然密集的釋放常引發西僑之不滿情緒，曾多次在工部董事會議提出限定燃放爆竹之建議。1872年，工部局對燃放鞭炮的時間採取嚴格限制，規定自晚上10點至次日上午7點，禁止燃放爆竹。1904年，工部局《巡捕房章程》第八款規定，租界居民不准在馬路及公地燃放爆竹。倘欲於家中或天井施燃，必預先向補房領取執照。上海檔案館編：《工部局董事會會議錄》冊4，頁685；冊5，頁589。詳見羅蘇文：《上海傳奇：文明嬗變的側影(1553-1949)》(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頁315。

¹⁵⁴ 王爾敏：《傳統中國庶民日常生活情節》，氏著：《明清社會文化生態》(台北：臺灣商務印書館，2002)，頁76。

其中「曆書」作為節氣、活動之載體，是民眾舉措之法則，其重要性不言可喻。又，「曆書」由政府制訂，統一頒告天下，神聖程度不容挑戰：

民間日常生活活動，每年依據官方所頒正朔 大抵冬至日朝廷頒正朔，民間撰寫，販售營利，家家必備，以為全年生活依據。質言之，中國民間日常生活作息，一年活動節奏，自古代以迄近代，始終依據全國一致之年曆書，一般通稱為「時憲曆書」。¹⁵⁵

「時憲曆書」之存在，其作用類同今日各機關自訂之時間表，於時節流中為人們定下必做之事，刻不容緩。自古迄近，上從賢者為政論學，最重農時；下至一般民人生活作息，亦強調謀合天時節令，斷不敢倒行逆施。由於民俗背後，時時體現自然對人類生活之制約，更是人類面對變化、流動之自然與社會，企圖以心智與理性按客觀規律對自己生活方式的一種選擇。¹⁵⁶就此層面，傳統風俗被視為文化社會之根基，神聖且根深蒂固。於是，民眾性格中強韌的「穩定性」與「不變性」，力圖年復一年地將其延續、保留。在許多外來者眼中，中國人對風俗的維護，是造成此民族無法有所進步之主要原由，以為：「只要看過中國人對古代流傳下來的所有風俗習慣和耕作方式的恪守不渝 我們就不敢奢望目前農業生產的總指導思想會與古代有什麼不同。」¹⁵⁷然而，與遊歷者史密斯所觀察到之情況吻合，儘管中國人並不全然理解他們正在踐行的各式風俗，但因將風俗習慣視為至高準繩，致令執意予以維護。¹⁵⁸

涂爾幹認為「日曆」有其重要的社會功能，表達了集體生活的節奏，與此同時，它的功能又確保了這些活動的規律性。¹⁵⁹基此立論管窺「陰曆」於今日能安然存在，不遭時代汰換，自有其存在之社會價值。

人類學家透過田野研究發現，不同的時間類型，可並行不悖地存於日常生活中，儘管兩者的發展基礎不同，最終總能取得平衡協調。舉新、舊曆並用為實例：「陽曆」與「陰曆」為兩種不同之時間類型，因各有其歸屬與意義，遂同時為人所需：「陽曆」隨全球化之擴張過程，在實際生活與節奏上，成為多數人類社會共有之時間基礎；「陰曆」則退居其後，於特定的社會文化與獨特儀式活動上，

¹⁵⁵ 同前注，頁 77。

¹⁵⁶ 有關民俗與人類社會、心理相互作用之關係，詳見忻平著：《從上海發現歷史：現代化進程中的上海人及其社會生活(1927-1937)》(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頁 469；另外，「民俗」與文化間，又如仲富蘭論證：「民俗式溝通民眾物質生活和精神生活，反映著並主要通過人為載體，進行世代相傳和傳承的生生不息的文化現象。民間社區和集體的人群意願，進行世代相傳和傳承的生生不息的文化現象。」見仲富蘭著：《現代民俗流變》(上海：生活 讀書 新知三聯書店，1990)，頁 212。

¹⁵⁷ “Agriculture in China” in The Chinese repository(Canton : Printed for the proprietors,1834),vol3,p.112.

¹⁵⁸ 詳見解本亮著：《凝視中國：外國人眼裡的中國人》，頁 119。

¹⁵⁹ 見愛彌爾 涂爾幹(Durkheim, Emile)著，芮傳明、趙學元譯：《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頁 10。

塑造獨到之社會文化時間。¹⁶⁰兩者時間類型之生成，不只與社會組織及社會結構有關，更涉及不同之認知體系。前者是建立在實際活動與非儀式性之溝通上，其發展出的分類概念往往趨於認知上的普同（cognitive universals）。反之，後者則建立在個別獨特的祝典活動與儀式溝通上，它的分類概念往往凸顯異文化的奇特性與穩定性。¹⁶¹今日「陰曆」在華人社會裡，仍對特定人群產生作用，如農民與漁民，還是按著陰曆所標示之時日進行生產活動；適逢廟會祭典、節慶崇拜、婚喪嫁娶與破土重遷，人們業已習慣以陰曆作為擇日定時準繩。自文化視域端詳，陰曆在陽曆的強力擠兌下，已不佔據國曆之地位，政府機構亦不再以其作為編排時日之參照，但自影響層面言之，陰曆憑藉著堅強的民俗底蘊與承傳，仍在民眾生活中起著無形作用。於是，看似互不相容之新與舊，在中國人切身體驗與、衡量下，取得巧妙平衡，借用羅志田之說法，可窺一斑：

一般人視為不兩立的新與舊，不論在社會史意義上還是思想史意義上，或者是在兩者互動的意義上，都不是那麼截然二分，毋寧說更多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¹⁶²

新舊之間各有其擁護與實用價值，儘管欲以新代舊，其中磨合而後相互滲透的過程，又豈可截然二分。何況對千萬中國人來說，早已根深蒂固之陰曆，其中蘊含先人對天地生成的複雜思維與詮釋，屬文化傳承之重要脈絡，其堅毅程度更難以撼動。無庸多言，即便面對全球性攜來之強勢時間，中國人仍按其方式，做出決斷性的捨與用。正如科文(Paul A. Cohen)所言：「衡量這些問題之歷史重要性的準繩也是中國的，而不是西方的。」¹⁶³「陰曆」對中國人之必要性，及其在歷史洪流中做出的諸種奉獻，當回歸最初源流方可見其厚實、頑強的影響。

第五節 小結

丹尼爾 J 布爾斯廷 (Daniel J. Boorstin) 針對時間與近世生活間的微妙干係提出精闢的審視：

在歐洲，人為的鐘點，即機械的鐘點，取代了曆法世界的計時，衝破了占星學的半陰影，進入明朗的日常生活。當蒸汽機、電力及人工照明使工廠

¹⁶⁰ (法)愛彌爾 涂爾幹 (Durkheim, Emile) 提出「社會時間」(social time) 概念。社會時間往往透過儀式性或社會性的活動做為對象，以活動的起點或結束作為衡量之單位，形成一種特定的時間型態。例如歲時祭儀之節奏與律動，一方面源於社會生活，另一方面，卻也規範了社會生活，成為無形之準繩，詳見同前注，頁 10-19。

¹⁶¹ 詳見黃應貴：《時間歷史與記憶》，頁 24。

¹⁶² 見羅志田：《權勢轉移：近代中國的思想、社會與學術》(武漢：湖北人民出版社，1999)，頁 13。

¹⁶³ 見(美)柯文(Cohen, Paul A.)著，林同奇譯：《在中國發現歷史：中國中心觀在美國的興起》(台北：稻鄉出版社，1991)，頁 170。

晝夜不停進行工作的時候，當黑夜可以轉化為白晝的時候，人為的鐘點，亦即時鐘上標明的鐘點，對每個人都成為不變的生活規則。這樣，時鐘在西方興起的歷史就是新的生活方式和擴展公眾生活舞台的歷史。¹⁶⁴

若干文句明晰交代鐘點時間如何從歐洲發源、配合蒸汽、電力與照明工具之發達，致令無處不在、無所不管的現狀。隨同工業社會對高效的講究，管理時間是近世工藝、智能與藝術結合的展現手法，越來越精細的科技設法利用加速聯繫和增加效率以「節約」、「省儉」時間，創造富有成效的時間經濟原則。無論從先驗或追溯的角度以討論「時間」對社會的影響，都不容洩視「時間表」之存在價值。

「時間表」從其生成、存在與歷久不衰地擴大使用，無處不昭示時間的「標準化」與「定則化」，為人類社會打造生存的基本秩序：從工廠時間表對工人階級的制約、學校課表對學子課業、作息之排定、以至乘坐運輸工具各有定時，時間不僅亦步亦趨地擴大其管束範圍，更成為生活內不可承受之輕。

「時區」之出現亦是工業時代偉大革新，地球像齒輪般運轉，它與宇宙之輪無隙地咬合，將時間等序區劃，使人類在一千哩距離、經度十五度內保有一個小時，不致紊亂，使以速度見長的電報、交通工具，得以有系統地、無時差地完整串合。標準時間不僅抹去有形的距離，並透過無數中介將人們置於共時時空，繼而打造一元的文化觀、世界觀：即是無可自外之「全球化」體系。正如所言：「時間被傳媒化、世界化，它把新聞時間加強給我們的生活，正如人們曾經以太陽、季節、收割的需求，按照狩獵或畜牧的節奏，按照各種任務的節奏來生活，這些任務把自己的節奏加給人類。」¹⁶⁵人們穿梭於公共空間對著公用時鐘調時對秒，或恣意覽閱報刊帶來無遠弗屆的彼端新知，無一不讓自己在標準時間範疇中，找到共時的當下，以確認自己與他者的真實存在。往昔人們的生活仰賴自然天候與基本生存需要為警鐘，而現代社會則受制於無處不在之鐘錶，以及由傳媒報刊所加強賦予的共時感知予以維繫。

1868年太平洋西岸的島國日本，雷厲風行地進行明治維新。自此，日本大力鼓勵與移植西方經驗為首要目標：針對食衣住行各層面，頒佈諸多政令，如允許士族和平通婚、著令西式禮服為正式服儀，獎勵臣民衣西裝，及廢除天保曆改採陽曆。這些法令標的分外昭著，就是藉由各式革新，廢除從中世紀以來的風俗習慣，以建立一個適應世界潮流和日本國情之文明體系。無獨有偶，在十九世紀與二十世紀交會時，相同場景全然移植至中國場域，重新搬演。亟思改革的先進者將中國近世之落後，歸咎於冥頑不化的舊風俗所囿，以為在列強環伺的世界局勢

¹⁶⁴ 見(美)丹尼爾 J 布爾斯廷(Daniel J. Boorstin)著，陳琳林譯：《發現者：人類探索世界和自我的歷史、時間、陸地和海洋篇》(台北：自華印行久博總經銷，1986)，頁106。

¹⁶⁵ 見西爾維婭 阿加辛斯基(Agacinski, Sylviane)著，吳雲鳳譯：《時間的擺度者》(北京：中信出版社，2003)，頁48。

中，唯有以強勢西方為鏡像，方得打造理想新中國圖像，從鐘點時間的操演、宣揚陽曆之使用、鼓吹節時的活動，時間在此指向兩個不同象限，新舊根據人們切身需求，或多或少地彼此吸納、汰換，留下當為合用的歷史痕跡，各自在適合的時刻發揮效用，滿足人們需索。用波特萊爾的話語以作總結：「我們全部的獨創性全來自時間打在我們感覺上的印記。」¹⁶⁶中國的現代性複雜曲折地顯露不同時間意識，率由民眾依據所需紛自領受，但是總體而言，在中國社會及文化之進展中，一個現代的時間觀以及相對應的現代思維、現代生活方式，卻逐步地進入中國人之意識，次第對現代中國人加以形塑。

¹⁶⁶（法）見波德萊爾（Baudelaire, Charles）著，郭宏安譯：《1846年的沙龍：波德萊爾美學論文選》（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2），頁426。